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趋向完整的中国

BOOK
网络资源 非纸书

第一章 回归！回归！香港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香港，中国的香港，弹丸之地，曾名不见经传。

大英帝国的强占，香港百车遁民地统治成为现实。

自从它被强盗抢去的那一无起，多少中国人魂牵梦绕要收回香港，并且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清朝的广东地方官员和当地居民的反英斗争；巴黎和会为什么没有据到香港问题，英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场虚惊；华盛顿会议提到过归还租界问题；武汉国民政府用行动收回了九江、汉口英租界，为收回香港给英帝国主义敲响了警钟；开罗会议上，就香港问题，蒋介石与丘吉尔发生争论；这一切都没使香港回归成功。

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

19847 香港，中国的香港，弹丸之地，曾经名不见经传，若不是 1841 年大英帝国的无耻侵略，若不是中国当时的腐朽政府的丧权辱国，这一荒凉的小岛将会同中国的其它领土一样，乘坐着中国历史的长车，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共同繁荣。1841 年，让中国人绝对不能忘却的 1841 中国，1949 年成立的新中国，它把中华民族带入了强国之林，香港回归的梦想步步成真。国人对香港回归的渴望强烈了。现实了。国人看着屹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天安门广场和深圳罗湖桥上的“香港回归祖国倒计时”大钟表，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中国人都自豪、*19841997 人民共和国。饱含屈辱的中国历史将从此改变，但屈辱的历史不能忘却。

清朝臣民为何如此钟情鸦片，俗称“大烟”“阿芙蓉”，是由红罂粟的青果汁液，经过割取、晒干、凝缩而成的软膏。其主要成分是吗啡，是一种强烈的麻醉剂，它原为药用，用于止痛、镇定，但若食用过量，毒性便会伤害身体，而且极易使人上瘾。烟瘾发作时，人极其痛苦，只有鸦片可*封建社会的中国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鄙视商业，抵制洋货。康熙五十八年，勇敢而英明的康熙大帝宣布禁止南洋贸易，明令国人不许下海，夷人不许进入中国，直至雍正五年。到乾隆二十一年，广州设为通商口岸，以体恤地处荒凉偏僻的包括洋人在内的“*随着中外通商，中国的茶叶、大黄、丝绸等深受英国欢迎，饮中国茶不仅成为一种时尚，而且成为身份的标志，英商的银钱开始流入中国。中国对英贸易一直处于出超地位。这使本来急需向外输出资本的英国不能容忍，为了本国利益，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

英国商人走私鸦片获得了高额利润，高额利润使英国好商利令智昏，向中国人大肆倾销。当时，每箱印度鸦片的成本为 20 卢比，走私到中国后，售价在 2000 卢比至 3000 卢比。暴利蒸红英商的眼睛，灭绝了英商的良知。1767 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烟上不超过 200 箱鸦片的毒瘾自然诱惑着吸食鸦片的清朝臣民，但这不是中国清朝对鸦片的钟情，而是资本掠夺的特性，是英商逐利的本性。英国一面以贸易为手段，攫取清朝的白银，一面以贸易作掩护，残害清朝的臣民。

清廷岂能坐视不管，英国欲壑难填面财鸦片的入侵，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外流，环顾吸食鸦片面造成的民风日下、身体渐跨、国库空虚的状况有

志之士无不疾呼“禁烟”。

清廷对于洋人鸦片的输入，早在乾隆四十五年即 1780 年就禁令输入烟具，鸦片只能作为药用。雍正十年，也颁布了禁烟令。但清朝的朝臣官员们仍有吸食鸦片的特权。两广总督吉庆曾奏请禁烟：以外夷之泥上，易我中华之银钱，实属可恨。且恐内地臣民吸食甚众，致*在清廷力主禁烟但收效甚微的时候，大臣则围绕禁烟发生了一场争论。以大臣许乃济为代表的缓禁派主张鸦片买卖合法化，照章纳税，并允许内地种植罂粟，以国产鸦片来抵制外来鸦片，从而阻止白银外流。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立即予以反对，从生产力、商业、*1838 始了历时 22 天的虎门销烟，虎门销烟是自嘉庆帝颁布禁烟令以来最为彻底的一次大规模禁烟，官首次向世界表明中国人禁烟的坚决性，洗雪了鸦片给中国带来的耻辱。英国鸦片商从此不再驻华商务总监义律面对滚滚烟云，除为中国政府彻底的禁烟所叹服外，使更加仇视中国。销烟侵犯了英王的私有财产，禁烟断送了英商的财路，他立即把中国禁烟的情况向英国外相巴麦尊报告，并建议英国出兵中国。巴麦尊说“先揍他一顿，再做解释。”1839 院以微弱多数正式通过了对华用兵的方案。并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侵华正副公使，伯麦为海军司令，带领军舰 16 只、运输舰 27 只、大炮 540 门、海军 1.5 万人由印度入侵中 1841 年 8 月 29 日，中英双方在南京江岸英舰“汗丽华”号上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其中规定：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贮所用，今大清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及嗣后世袭之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贪婪继续怂恿着英国侵略的野心，19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已经不满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取得的特权和贸易。1854 年英国新任公使包令赴任之后，向中国政府提出修约，咸丰帝钦命大臣叶名琛接见随同英国的法国、美国三公使，叶名琛奉谕逐层批驳了英国的要求，1856 月决定再次侵华。当年 7 月，英司令额尔金率舰队到达香港。10 月，法国借口“马神甫被杀案”，派葛罗率兵入侵中国。12 月，英法联军 5600 多人向广州进逼，著名的“不战不和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总督叶名琛以静待英法联军的入侵，结果可想而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攻破大沽炮台，咸丰帝胆战心惊，急令大学士杜良、吏部尚书花沙 1860 政府为其指定的进京路线，遭到大沽炮台清军的炮击。1860 年 10 月 6 日英法联军进犯北京西郊圆明园，把皇家珍宝洗劫一空后，将集中西建筑之大成的圆明园付之一炬。10 月 13 日英法联*18631864 为“新界”的地方愈感兴趣。这块地方位于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包括大鹏湾、深圳湾以及周围的 235 个岛屿，面积达 975.1 平方公里，人口约 10 万，隶属广州府新要县。

1895 火打劫”的建议，英国和香港的商业团体欲火很旺。1895 年 4 月 17 日当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赔偿 2 亿两白银的军费给日本时，英国眼红了，它不甘落后。1 英国强租中国的威海卫后，英国政府提出了香港扩界的范围为：包括深圳湾到大鹏湾的一直线，作为北界，南界至北纬 22°9'，东至东经 114°30'，西至东经 113°52'。陆地比以前扩大了 10 多倍，水域比以前扩大了 40 至 50 倍。

1898 界，作为新租之地，以 99 年为租借期限；英国所租之地内有大鹏湾、深圳湾水面等；所有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唯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增加割让“九龙司*18631864 为“新界”的地方愈感兴趣。这块地方位于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包括大鹏湾、深圳湾以

及周围的 235 个岛屿，面积达 975.1 平方公里，人口约 10 万，隶属广州府新要县。

1895 年“火打劫”的建议，英国和香港的商业团体欲火很旺。1895 年 4 月 17 日当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赔偿 2 亿两白银的军费给日本时，英国眼红了，它不甘落后。1 英国强租中国的威海卫后，英国政府提出了香港扩界的范围为：包括深圳湾到大鹏湾的一直线，作为北界，南界至北纬 22°9′，东至东经 114°30′，西至东经 113°52′。陆地比以前扩大了 10 多倍，水域比以前扩大了 40 至 50 倍。

1898 年，作为新租之地，以 99 年为租借期限；英国所租之地内有大鹏湾、深圳湾水面等；所有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唯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至此，近百年的香港疆域及英国对香港地区的殖民统治确定下来。中国屈辱割让香港沧桑百年，1997 年香港重回祖国怀抱，怎不令世人瞩目！2. 中国历史的长车始终载着香港香港，中国的香港，自 1841 年被割让，无异于在中华民族的身躯上割下了一块滴血的肉。主权完整是国之根本，收回香港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历史永远载着香港疾驰，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

侵略与反侵略永远相伴 1001841 与清朝钦差大臣琦善订立《穿鼻草约》，“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统治”。香港居民立即表示反对英国的侵略行为，内地爱国官员、乡绅也行动起来。当时林则徐已被革职，但暂留在*群情公愤迫使道光皇帝认识到：割地有伤“天朝”体面，赔款将从何出。1841 年 1 月 27 日答应英国提出的《穿鼻草约》的清政府钦差大臣琦善革职查办，抄去家产。

在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复香港的呼声中，爱国官员裕谦主张召募本地水勇“攻剿香港”。

广西巡抚梁章矩也主张“认真团练乡勇，以收复香港为首务”。1841 年冬，当英军北上进犯闽浙期间，参加三元里抗英斗争水勇头人林福祥上书两广总督，义正词严地宣称“夷不可*1841 住，务当极力驱逐，毋为所据。”此后多次下令“相机攻克香港”，直到 1842 年 5 月，他还说：“香港地方，岂容逆夷久据”，如已准备妥当，则应“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派钦差大臣黄宗汉密筹“乘夷兵赴省之时，捣其香港巢穴”。遗憾的是，清政府软弱腐败，不但没有“收复香港，以伸国威”，反而步步妥协退让，相继割让九龙，“出租”“新界”。

1899 年 5 月 16 日，英军以武力强占了九龙城寨。对于港英当局不顾《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以武力方式剥夺中国政府管辖权力一事，清政府向英国发出照会，表示强烈抗议。半年之后，然而，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香港永远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主权在中国。

收复香港成为国际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1917 年，中国和希腊、巴西、古巴、利比里亚、暹罗（泰国）及其他一些中南美国家也加入了协约国集团方面参战。1918 年 11 月协约国以战胜同盟国而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战后的世界，以图建立帝国主义新秩序，于 1919 年 1 月 18 日召开巴黎和会，20 多个战胜国出席了会议，中国北京政府派出了一个出席会议代表团，团长为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并有南

方军政府的外交人员参加。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3）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包括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势力范围等；（4）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巴黎和会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的主权。

然而，巴黎和会完全被英、美、法、意、日列强操纵，尽管列强之间在利益争夺中存在矛盾，但他们争夺的对象并没有改变，中国政府难以如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得到最多，其它列强深为不满，尤其是美国。而中国代表团中有的亲日派，更多的是亲美派*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人们义愤填膺，于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学生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除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的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巴黎分赃会议，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巴黎和会在列强的强权之下，既没有真正解决远东问题，也没有解决中国问题。同时由于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美国国会拒绝批准这一和约，使日本妄图独占山东的野心没有成功；美国、英国既没有通过巴黎和会在东方取得盼望已久的利益，也不愿日本独*1921及太平洋问题，并将中国问题列入远东国际问题之中，却不关心中国的主权完整和独立，也不愿轻易得罪与其争夺利益的对手——日本，中国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有驻美公使施肇*（2）取消特殊地位。（3）订立公断条约。（4）关税自由。代表团于11月16日提出十项原则：各国尊重并遵守中国领土完整及行政独立原则；中国声明不以本国领土或沿海地方之无论何处割让或租借与无论何国；中国赞同开放门户、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并自愿将其实行于中国各地，*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顾维均于1921年12月3日要求取消和早日停止使用所有的租地。此要求一提出，又引起各国代表的纷争和抵制，尤其是英、日两国代表。迫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压力和英、美、法、日之间存在的矛盾，美国力图迫使日本交出胶州湾“租 1926 国民政府与帝国主义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国民政府对英帝国主义采取了单独对英的外交政策，以分化英、日、美联合阵线，孤立英国，中立美、日，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五卅北伐中，国民政府联席会议作出决议：租界已成为反革命大本营，即革命之陷阱，革命即须打破此陷阱者，此后收回租界应用为革命之事实问题，1927年1月3日“一·三”惨案的发生激怒了武汉群众，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决定设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租界内一切公安市政事宜。2月19日，签订了《汉口英租界协定》，3月15日正式收回。紧接着，国民政府收回了九江英租界。

汉口、九江英租界相继收回，使英国当局坐立不安，香港总督金文泰竭力鼓吹合并新界，以免失手。金文泰曾受权声明：“当内战的战火不幸在中国燃烧之际，英王陛下政府要全力保护香港及其大陆部分。他们绝对不会交出香港，不会以任何方式在英国统治的大陆的*1941 吉尔向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表示：日本战败以后，它占领的全部中国领土，将由中国收复。

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也开始谴责英国的殖民政策，质问英国为什么不把香港交还中国，为*1943 介石提出战后中国拒绝英国军舰驶入中国港口，取消英国在中国的涉外法权和收回租借地的问题。罗斯福支持蒋介石的意见，并问蒋介石：“你对香港问题如何打算？”蒋介石还未回*在讨论对日本作战从广州湾登陆问题时，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提议由美国海

军陆战队和中国驻印度的两个加强师从广州湾登陆作战，当即遭到英国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将军的反对：“这是一件令人感觉奇怪的事件，在广州湾登陆何以没有英国部队参战？”中国人民尽管为收回香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旧中国政府的软弱妥协和国力衰弱，由于帝国主义的强大和蛮横，香港依然掌握在英国手中。3. 中国共产党为香港精心努力 1925 地支持了这场斗争。1946 年 7 月，中国中央派方方到香港领导华南党组织工作。1947 年 1 月 16 日，中国决定成立中国中央香港分局，即华南分局的前身，全面加强对于华南地区斗争的领导。

中国中央香港分局所做的工作为：(1) 建立宣传文化阵地，同时团结香港其它友报友刊，广泛宣传中国中央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1945 年 11 月 13 日办起了战后第一家中国报纸《正报》。1946 年 1 月 4 日，战前发行的《华僑报》复刊。还创办了中国出版社、新民主出版社。后来，槽继创办了《群众》(2) 团结各个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的知名人士，帮助各民主党派在香港发展组织、推动反美反蒋工作。1946 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原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文人作家都纷纷转移到香港。香港工委专门设立了统战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联系上层人士的工作。我党各级 (3) 护送爱国人士北上筹组新政权。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国中央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从 1948 年 9 月到 1949 年 9 月，先后输送 20 多批民主人 (4) 开办学校及各种学习班。在中国中央香港分局的推动下，由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出面，于 1946 年创办了一家新型大学---达德学院，以图“研究高等学术，养成为人民服务的实用人才”。学生大多为香港青年，也有一些来自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各地。在解放战场上节* (5) 发展基层组织。香港分局经常召集各地区党组织和部队的负责人到香港开会，传达中央指示，总结工作经验，并逐步建立起党委集体领导制，改变了过去的个人负责制。为促进各地党组织的发展，香港分局制定了党组织规则，举办了组织工作训练班。经过两年多一串晶莹的泪珠尽管香港被英国割去之后，深受英国重视，为了香港的繁荣，英国苦心经营，但是繁荣的背后，也有着香港居民痛苦的泪滴。

华工开拓香港泪英国在占领香港初期，由于香港的殖民统治机构并未完全建立，实际上在推行着半军事统治。香港法庭有权审讯在香港或在中国大陆、中国沿海 100 公里内的海上犯法的英国人，同时继续推行首任香港裁判司威廉坚的一套限制华人行动的自由、实行宵禁的政策和措施。

香港开拓初期，由于香港的卫生条件较差，瘴气（疟疾）流行，不少英国人因不适应香港的气候而死亡或逃跑，加之附近海盗猖獗，很多英国人对香港的前途、信心开始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活命，内地的穷苦人民和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逃难”的太平军人也逃*19 港立法局通过“维持治安条例”，严禁华人携带和收藏武器、不准发布文告等等歧视政策，引起华人强烈不满。1884 年，香港华人自发组织起来打击挑起中法战争的法国人，港英当局*在香港经济繁荣的同时，香港人民回归祖国的觉悟也日见提高，港英政府对此极力压制。例如 1913 年 10 月，香港当局市制改革，禁止外国货币包括中国银毫和铜元在香港市面流通，香港电车公司首先实行，引起香港华人的愤慨。许多香港华人彼此相约，拒乘电车，致*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香港华人的爱国热情与日俱增。于是香港便强迫所有

的团体必须登记，从 1991 年到 1920 年，香港劳动组织受到港英政府的严格控制，工人运动被禁止。1922 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全面胜利之后，1925 年 6 月，为声援上海“五卅”日军铁蹄下的港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了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为了切断中国抗日力量同国际接触的南方交通线，于 1941 年 12 月 8 日清晨出动 12 架轰炸机袭击香港唯一的飞机场——启德机场，日本陆军则渡过深圳海南进而开始了对香港的围攻。在 18 天的日英作战中，港英当在日本攻占香港的 3 年零 8 个月里，其法西斯军国主义本性暴露无遗，他们无法把香港的社会秩序真正地稳定起来，反而常常借口检查，随意闯入民宅，为所欲为，10 来岁的女童和 60 多岁的老妪被日军轮奸的事情时有发生。对居民的粮食、蔬菜、烧柴等日用品供应则实*日本为支撑太平洋战争的败局，加紧经济掠夺，使香港地圉遭到空前的浩劫，百业俱废，一片萧条，经济衰落。米价飞涨，维 j 活用品奇缺，居民饿死者不计其数，惨不忍睹。

“东方明珠”黯然无光。

日本在香港推行的“香港日本化”运动使得香港陷入灾难的深渊。日本当局不但将香港地区划分改为日本体制，还在教育上强力推行奴化教育，取消英文课，规定日语为主要课程，华文课被缩至极少。学生倘有反日情绪或日语成绩不好，就会惨遭政治迫害或当众被打*日本在香港犯下的滔天罪行如同在内地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军国主义已被牢牢地钉在了耻辱柱上。当 1945 年日本作为战败国从香港撤退后，英国军队于 1945 年 9 月重新踏上香港地区，英国的“归来”，并不是为了拯救港人于水火之中，而是为了重新占据香港，港民为何骚动 1946 说，他们不可能得到更多的实惠。随着中国内地形势的发展，人民解放军势不可挡。此时，香港各阶层人士非常活跃，出现了许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创办的刊物杂志，宣传中国革命形势 1949 年，港英当局又通过《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等，使在港华人行动失去自由，精神上增加了一种重大压力，造成香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使香港在四五十年代笼罩着恐怖气氛。

从 1950 年 4 月开始，港英当局又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华人行动自由的条例，新修订了移民条例，限制内地中国人进入香港，在香港与深圳边境地区实行“宵禁”，限制居民晚间行动自由，还无理拘捕和押解一批华人出境，进一步恶化了当局同华人的关系，致使香港社会— 1951 些社会团体，组织“粤穗慰问团”，拟于 1952 年 3 月 1 日乘车至港慰问。港英政府闻讯后，出动军警严密布防，通告禁止慰问团入境。当天，香港部分居民组成欢迎粤穗慰问团筹备委员会*1956 组织，与台湾有着密切联系。双方密谋，以庆祝双十节为名，强迫居民到处悬挂国民党党旗，造成到处一片“旗山旗海”声势。10 月，他们借口李郑层徒置区 G 座墙壁张贴的国民党党旗*60 常罢工，港英政府对此采取镇压措施，引起香港人民的更加反感，1967 年 5 月起，香港一些青年工人和学生受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适当地搬用了内地“文革”的做法。当时，薪蒲港人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派出警察逮捕和打伤工人，警察与工人发生冲突后，港英政府实施宵禁。不久，“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5610 通、公共事业、船坞、金库及纺织等工人大罢工。港英·当局同时实行停职、解雇、关*7 英当局在围捕侨冠大厦及华丰国货公司时，竟出动英国航空母舰，用直升飞机运载大批军警，携带现代化武器，降落在该大厦天台上。冲突蔓延到香港边界地区，

沙头角边境居民举行 1967 局武装冲突的顶峰。5.“和氏璧”闪烁其光英帝国主义占据香港之时难以想象日后香港会如此繁荣，如果今日香港曾是当时的梦想，当初，香港的英国人是因为香港的瘴气而欲罢休，也不会因为与港人的矛盾而失去信心。一个贫穷落后的渔村在英国殖民统治者手中居然发展成为光彩夺目的宝玉、璀璨的*香港由其特殊的经济政治因素所决定，它所取得的最瞩目的成就就是经济的高度发展，而被世人誉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当今香港已是世界的贸易中心，80 年代后期香港对外贸易在世界最主要的出口国家和地区中居第 15 位，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钻*香港自由港的范围包括整个香港地区，被称作自由港城。在香港，一般商品不仅可以免税自由进出，而且可以加工、制造。市民可以在自由港内居住，本地居民和外来旅客可以自由买卖港内的外来商品。同目前世界上仍然存在的传统自由港相比，香港的自由程度首屈*今天的香港已由单一的转口贸易港发展成为经济结构多元化的自由港，它已是金融、贸易、工业、航运、旅游、信息等多项国际中心，而已商业、房地产、建筑和饮食服务等行业也都很发达。众多的自由港功能，非但不杂乱无章，而且结构完善，能量很大，各个经济*香港使多国多方都能从此获得利益。香港的自由港政策为多国多方在此发生的经济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使香港成为做生意赚大钱的好地方。许多行业的盈利率与其他地区相比要高出很多，如银行业 1988 年的年均回报率高达 13.8%，房地产业的回报率平均为 10%--来自欧美、日本、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不断扩大，并从香港获得了巨大利益。

仅美国和日本就各自在香港投资 60 亿美元左右。美国已把香港作为它在亚大地区的重要出口市场，1988 年香港市民人均购买美国货价值达 998 美元，比购买欧共体的 234 美元、日本的 308 美元和台湾的 613 美元都多得多。美国还把香港作为它在亚大地区的商务基地，1989*英国在其殖民地香港的投资能够获得最佳的利益则是不言自明的。英国在香港的商业机构和投资十分广泛，已有 400 多家英国公司以全英资附属公司或联合企业方式成立。此外，在香港的最大公司中，很多是由英国人管理，而且大部分股份也有英国人持有。1989 年，英中国自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内地资本在香港投资数目明显增大。除中国银行、华润、招商局、中旅等集团以外，其他大公司和各省、市也都纷纷在香港投资。中资机构的经济活动也促进了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的经济联系，大陆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香港成为大陆*1978 年至 1988 年，大陆吸引香港投资占中国外资合同金额的 2 / 3。

香港随着其自由港经济的发展，港内华人投资在战后几十年中获利优厚，财力骤增，出现了李嘉诚、包玉刚、郭得胜、郑裕彤等华人巨富。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利润率很高，如长汇实业在 1972 年成为上市公司时资本只有 9000 多万港元，到 1989 年底股票市场值已达 212 曾几何时，成千上万的人从中国大陆，从东南亚，从世界各地涌入香港，谋生存、发财之路。今天，又有无数人甚至比任何时候都迷恋香港，渴望到香港一展雄才大略，实现自己的梦想。6. 香港离不开大陆香港离不开大陆，香港离不开中国，不仅是国家主权使然，不仅是所有中国人的心愿，不仅是中国政府的努力，而且香港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大陆，乃至居民生活也离不开大陆。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政治上稳定香港、经济上支持香港的政策始终如一，香港获益匪浅。内地经济直接影响香港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向上走，就有人来做生意，香港就稳定繁荣。正如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一样，

香港离开了中国大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对香港的繁荣大到政治问题，小到淡水供应、蔬菜供应和电力供应，中国政府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1962 年秋至 1963 年初夏，严重的干旱使香港土地干裂，淡水紧缺，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的水位也降到了死水位以下。到处可见水龙头前排队等水的人们，干旱正困*（1）向港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分开，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

（2）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较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

（3）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

（4）工程建好后，采取收水费的办法，逐步收回工程建设投资费用，水费应该实行经济核算。

1964 香港淡水，改变了香港长期缺水的局面。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种种不可分割的事实说明，香港离不开大陆，离开大陆，香港居民的生活就会受到严重影响，香港的经济就会遇到严重的 7. 中国英明，国威豪壮香港回归，终于有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步步走向胜利。随着 1948 年战略决战的隆隆炮声，南京国民党政府崩溃在即，中国统一的强大之势锐不可挡，举世关注中国的去向。

我国建国前夕与英国的“见面礼”1949 以“护侨”为借口泊于长江水域的美国、法国等国军舰闻风而逃，而自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以其素有虚荣和自傲，不识时务，依然将其军舰停靠在南京城畔的长江中。这艘“紫石”为此，英国政界掀起轩然大波，国会讨论的情况表明：多数议员抨击政府缺乏政治远见，认为英舰实无必要介入中国内战之险而在长江中航行。“炮舰政策”和“坚船利炮”在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粉身碎骨，在中国历史上结束了它的狂妄和肆虐。

“紫石英”受创后，1949 年 4 月 30 日，人民解放军发表声明，谴责英国军舰对我内河的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英国必须为此向中国道歉并赔偿损失，英、美、法等各国的武装力量必须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面对崭新的中国，英国变了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日子---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天，周恩来总*面对新中国的飒爽英姿，面对毛泽东主席的宽广胸怀，面对“中国人民欢迎加强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努力”、英国政府欲承认新中国，却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牵制和制约，而没有马上下定决心。美国要求英国在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上与其采取一致的态度，英国则游*1949 国：1950 年 1 月 6 日将是英国承认新中国的日子。

当然，英国承认新中国，也基于其自身的利益。首先，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力锐减，无力介入中国内战，与中国少了一些瓜葛，中国革命胜利后，它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顺势调和拘禁了保护这些财产的中国员工。中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并采取了相应的*从 1950 年 6 月至 1953 年 1 月，港英当局先后劫夺了中国广东省人民政府水产局在香港的 5 艘渔轮；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 1953 年 3 月 1 日征用了广州英商太古分公司的码头仓库及楼房的全部财产。

新中国成立后，从油轮、飞机到渔船、仓库等，与英国进行了一个又

一个回合的斗争，既反映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清除英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艰巨性，也有助于巩固新中国的独立地位阳主权，显示了中国政府的威严。

朝鲜战争中，英国曾经投票赞成对中国实行“禁运”，这不但没有使英国捞到利益，反而致使中英贸易骤减，英方损失严重，也算是英国失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注意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兴起了有别于美国的立场，保守党一再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中英双方相互磋商，达成建立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中英两国一边改进两国外交关系，一边发展贸易关系。

总之，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随着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香港本应被随之收回，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军事封锁，由于中国建国之初需要巩固新生政权，瓦解帝国主义阵线，集中力量对付美帝* 中国的立场站定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中国政府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了一个共同的立场：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1979 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将来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前提是香港系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 1979 的提问时说：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当租约期满时，我们将以适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979 1981 变化的话，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将不会受到损害。

1981 中国军队进驻一条外，其它方针政策都适合于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这实际上间接地公开了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参考方针，1982 年 4 月 6 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重申了统一台湾的九项原则，这也适用于香港。

1979 着 1982 年 4 月至 6 月在乌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对阿根廷的胜利，带着香港问题，于 1982 年 9 18 1982 其语言之强硬有力，深深地震惊了英国的“铁女人”。邓小平说：“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 1997 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 1997 年的 15 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他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 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如果 15 年后还不收回，“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 1997 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在 15 间*“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经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会议之后，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今天，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

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领导人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从此，中英两国开始谈判。谈判桌上显身手 1982 立场，也为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的谈判定了调子，“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

1983 一项新闻公报。“在 1982 年 9 月两国领导人会谈以及后来进行有益的交换意见之后，双方同意关于香港未来的第二阶段会谈将于 1983 年 7 月 12 日在北京开始。”9 月 5 日，宣布了两国政府代表从 1983 年 7 月 12 日到 1984 年 9 月，中英双方的第二阶段会谈共进行了 22 轮，谈判相当紧张激烈。中国在坐到谈判桌前的时候，首先划定了谈判的期限，如果两年内达不成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政策。英国虽然口头上认为中国划定谈判期限无济于事，但它心*英方在第二阶段实质性谈判的第一轮到第二轮期间，仍然坚持 1997 年后英国继续管理香港，认为香港的主权可以归还中国，但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治。尽管英国在 60 年代起就开始培养香港人对香港的归属感，力图以此抗御英殖民地香港地区居民对中国大陆的回*中英谈判就这样在主权问题上搁浅了一年，在 1983 年下半年引起了激烈的争辩。这年 6 其背后也有人为因素，英国政府却借此大做文章，预言 1997 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后，香港的繁*1983 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政府改变态度，以免出现 1984 年 9 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于是在第五、六轮的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通过谈判解决了最难的在香港设立联合机构问题，解决了重要的土地问题以及其他具体的问题。1984 年 9 月 12 日，中英双方就解决香港的全部问题达成了协议，9 月 26 日双方代表在协议上签字。12 月 19 日，中英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协议。

1984 在中英关系的历程里，在国际关系中，这都犹如一座庄严的里程碑。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正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邓小平，这位历史的巨人，庄严地仁立在 12 的访问，显示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家风度，显示了她为中英会谈成功做出的重要贡献，赢得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赞赏。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署，展现了中国人*历史性的蓝图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三个附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风关于中英联络小组》和《关于土地契约》，当时还交换了关于国籍问题的备*国家问关于领土、主权的处理一般常用条约的形式，而我国政府要做的是收回香港主权，这是我国的内政，应由我方作出声明。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落入人手，所以在主权和治权问题的表述上采用“联合声明”的形式更为适宜，解决问题更加方便和有效。而有关*联合声明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以下称香港）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 1997 年 7 月：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第二款规定：“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 1997 年 7*联合声明第三款声明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1）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2）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5）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

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依法保障人身、自由、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罢工、选择职业和学术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力和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均受法律保护。(6)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独立关税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7)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8) 香港的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9)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同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联合王国和其它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10)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联合声明第四款规定：“自本声明生效之日起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止的过渡时期内，联合王国政府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以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给予合作。”在联合声明生效日时，成立中英联络小组，履行附件的职责，有联合声明的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规定了解决香港土地契约和其它有关事项的解决办法。中英双方在联合声明签署时互换的备忘录，解决了部分香港中国居民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问题。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得到了英国及其它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及金融经济界的广泛赞扬。

在这一宏大的蓝图上，1990 年 4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第十二项的规定，决定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附件《香港特别行政区*1996 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

1985 年起，每年会议由 3 次增加至 4 次。从 1988 年 7 月 1 日起，中英联络小组以香港为主要驻地，中英双方设了代表处，其工作将继续到 2000 年 1 月 1 日止。

1985 年 3 月 30 日解散。

1991 年 9 月 3 日正式签署。

1992 年起轩然大波，引起中英两国之间的严重争论。由于彭定康一意孤行，中国决定提前为香港平稳过渡做好前期准备工作。1993 年 3 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预备机构。1993 年 7 月 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决定。7 月中旬，预委会首次全会在北京举行。

1995 年筹委会的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400 名推选委员会委员已经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正待产生。

1997

第二章 “一国两制”

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继续保持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然而，有许多港、澳、台同胞担心，这样能行吗？“一国两制”下能

共同繁荣吗？对待这些问题，人们是困惑，还是充满自信？希望在那时……

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构想“一国两制”，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与祖国大陆分裂问题，恢复行使香港、澳门地区主权，以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是邓小平同志根据国内外的新形势，从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国家根据本国的宪法，在本国的部分地区，实行不同于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这些实行不同于国家主体部分制度的地区政府，是这个主权国家的地方政府，不能行使国家主权。

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内容之一的“一国两制”，有着特定的涵义。概括说来，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统一主权国家之下，国家的主体部分也就是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前提下，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得好，“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新事物不是别的国家提出来的，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叫做中国*根据中国十四大所表述的“一国两制”，可以看出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实行“一国两制”，国家的主权是统一的，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国家内实行不同制度的部分地区，是该统一主权国家的组成部分，不行使整个国家的外交、国防、宣战和媾和等权力。这就是说，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是国家的主*实行“一国两制”就是在统一的主权国家范围内，不同的地区实行两种制度，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多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国家的主体。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之后，原有的社会*实行“一国两制”，它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有宪法和法律的保证。实行不同制度的地区，如果发生争执，双方均应通过和平的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形式，规定在50年内香港、澳门的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未曾讲过的，它是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一国两制”构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不是权宜之计，不是玩弄手法，而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实行的一项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是一项战略构想。

“一国两制”构想的来龙去脉“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科学构想，首先是从中国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出发的。

建国以后，我党为解决这一问题作了一些设想和探索”其中一些原则性的意见，可以说是“一国两制”的思想先导。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台湾海峡两岸人为地造成了分裂局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5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

在 1950 年 6 月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问题。7 月，他同陈毅、张治中、邵力子等会见外宾时，又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愿望。周恩来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1957“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继这些最初设想之后，1958 年 10 月，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文告，谴责美国坚持侵略台湾立场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同时，向台湾当局提出结束海峡两岸军*但是，由于国际的和国内的因素，在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还不可能提出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解决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问题。

香港、澳门问题，同台湾问题的性质不同，不是和平统一问题，而是恢复行使我国主权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中国政府要在香港、澳门地方恢复行使主权是必然的。长期以来，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条件尚未成熟，而在“文化大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确定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解决香港这类关系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也只能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历史表明，“一国两制”的构想主要是在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然而，从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经过和平谈判恢复行使中国政府在香港、澳门的主权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来说，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原则性设想，*当时还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途径和措施，并且由于国内外的种种原因，已经提出的原则意见，也未能完全付诸实践。但是，应当看到，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和港澳问题，是有其历史连续性的。

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全党工作的重心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于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全会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前*1979 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阐明了实现中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告台湾同胞书》明确表示，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希望他们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台湾当局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反响强烈，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坚决拥护，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组织，都积极动员和推动所属成员利用他们在港澳和海外的社会联系，大力宣传和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它们还以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的历史，希望台湾当*1979 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访美期间，他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统一祖国的原则立场，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设想。1 月 30 日，邓小平向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解释*此后，“一国两制”的设想逐渐具体化。

1981 了为实现和平统一对台的九条方针政策。第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这九条方针政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的进一步具体化。这些政策是合情合理的，形成了“一国两制，思想的雏型。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九条方针政策，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也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

赞扬。

同年，邓小平在与美国人布热津斯基谈话中首次使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法。他说中国统一后，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资本主义，可以实行“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双方互不伤害。

但是，台湾当局散布“绝不陷入中国统战的陷阱”的言论，提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等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重申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并且邀请蒋经国、宋美龄、何应钦等人和台湾各界人士到大陆和故乡参观。

中国共产党指出，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都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民族的进步，希望国共两党再次携起手来，进行第三次合作，为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共同奋斗。但是，台湾当局仍然拒绝和谈，声言“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目标不变，等等。

对此，全国人大党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于1982年7月24日，在《致蒋经国先生信》中指出：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伤民族元气。实践于统一事业，蒋氏两代对历史有交待。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不大现实，未免自欺欺人。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1982局，审时度势，以国家前途民族大义为重，不要执迷不误，及早举行国共两党谈判，共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诚意，越来越有力地冲破国民党当局“不接”为了把叶剑英委员长宣布的九条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法律化，我国宪法赋予“一国两制”以法律保证。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特别行政区作出专门规定。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一基本立场，对于处理香港问题同样是适用的。宪法关于特别行政区的规定，为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后，也为我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后，分别在台湾、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并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样，“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就基本上形成了。

1982年友好的气氛中充分交换了意见。“一国两制”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根本方针。邓小平指出，香港仍将是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仍要保持。这就是在实际上提出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84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们多年来有个想法，用什么方法解决这种问题，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1984根本利益出发，鉴于历史的经验和台的现实，我们提出了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我们的各项建议和设想，都是诚心诚意的，通情达理的。”“我们认为，只要此后，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进一步对“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作了具体阐述。

1984年以理论概括，简称为“一国两制”。这样，“一国两制”的科学表述就完整地形成了。

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过程，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在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谈话时，曾作过这样的回顾和总结。邓小平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是几年以来，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形成了。这个构想

“一国两制”的依据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凭空想象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逐步形成的，实行“一国两制”，

有其理论根据、历史根据、社会经济根据和政治根据。

在谈到“一国两制”的理论根据时，邓小平说道：这个构想“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邓小平强调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提*“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在充分尊重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一个国家允许两种制度并存，这在私有制社会是不难看到的。在封建社会里，就有过奴隶制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有过封建制度的存在。

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一国两制”，让资本主义制度合法存在，这确是人们过去不曾想过而且也不敢去想的新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也未有明确表述。

于是，有人对“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性表示了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两种对立的社会体系，双方怎么能在一国之内长期并存和平共处呢？这是不是搞新的阶级调和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对立的。过去我们把这种对立看得过死，甚至把它绝对化了，水火不相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绝不能容忍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存在，否则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这只看到了两种制度之间“你死我活”，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的绝对性一面，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相对的统一和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一面。如果用这种形而上学的“左”的观点和方法去考虑问题，就不可能找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邓小平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看作是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他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力求从对立面中寻求同一，从各方面探求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的各种可能和条件。

从国共两党的关系来说，存在着共同点。就台湾而言，虽然由于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的原因，它与祖国大陆长期隔离，但从中国现代史看，国共两党之间存在过两次成功的合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和平统一祖国，国共两党存在着化敌为友，进行第三次合作的可*祖国大陆与香港和台湾，在经济上存在着一种互助互利、共同发展的关系。祖国人民同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虽然由于历史原因处于不同制度下的长期分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愿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祖国大陆与香港、台湾存在着互助互利，共同促*“一国两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则。

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国两制”构想，首先是坚持了原则的坚定性，主要表现为坚持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坚持这一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如何实现统一的具体问题上，采取一些灵活的政策和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就是，为了继续保持*“一国两制”是对列宁“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战略思想的具体运用。祖国统一后，实行两种制度在一国范围内的和平竞赛，一定会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的文明古国。早在 5000 多年前的黄帝时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民族，就开始了交往和融合”秦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以后，各民族进一步密切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形成了有共同语言、共*一个民族团结统一的基础，最主要是经济生活中有着共存的需要，并在经济联系的深远基础上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共同的传统文化传统，包括文字、伦理规范、共同信仰以及引以自豪的民族传统。这正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源泉和凝聚力所在。

在中华大地上碱多民族经过长期辛勤劳动，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华民族中，以汉族文化的发展最久远最成熟。几千年来不断完善和丰富儒家思想观念，逐渐为全中华民族所接受，成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赖以生存的政治文化基础。

中国文化以象形文字发展来的方块汉字作为自己进行思想交流的主要工具，自古以来，凡是中央政权的统治者，不论是否汉族，汉字、汉学都是他们必须掌握和运用的。这种共同的传统文化传统，共同的文字和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人强烈的统一心理。中国人都希望中国*国家统一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建立统一国家是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政治观点。中国近代以来，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更为一切爱国者和革命者所遵循。追求大统一，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义，构成了中华民族心理上的共同追求和信念。

台湾、香港和澳门，历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大陆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关系。

大陆同胞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的心是息息相通的，都是“龙的传人”，他们不仅血管里奔流着同一个民族的血液，而且心中也都承继着同一个祖先的美德。大陆人民离不开海外同胞。同样，如果没有大陆这个“根”作依托，海外华夏子孙就会孤悬海外甚至成为寄*近年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已成为全中国同胞的强烈呼声和海内外舆论的重要话题，身居台湾、香港的同胞和有识之士，思念祖国，思念故乡，盼望祖国统一。

在近代经济经受了上百年被侵略的屈辱之后，中华民族复兴中华之愿非常强烈。“一国两制”正是适应整个民族都要求统一和强烈的共同愿望提出来的。同时，这一构想又是冷静地面对长期分裂造成的双方确实存在着的明显差异而作出的明智决策。

在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极其落后的东方大国，在几乎是被封锁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自力更生地解决了 10 多亿人民的温饱*在台湾地区，国民党迁到那里以后，也实行了许多在大陆时期未曾采取过的政治经济措施，改革了土地制度，推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在台湾自然资源极其缺乏、人口密度非常大的不利条件下，台湾经济有了很大发展，80 年代以后被世界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国民*在香港地区，60 年代以后，由于充分利用了国际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包括价格低廉的资源和能源，抓住了美国向海外转移资金的机会，依靠香港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实现了经济起飞，正在向西方福利社会的标准发展，也被世界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长期实*澳门与香港也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经过深刻的实际的思考，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决定选择双

方具有的共同点，这就是在国家民族统一这一问题上全体中国人都赞成；而避开其他方面的不同点，包括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灵活采取措施而不要求一致。这样，“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成为中华民族“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不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尊重历史现状，而且也是从当代世界的情况出发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

当代世界的最大特征是，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

就目前的世界现实来说，资本主义国家还占多数，它们的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生产力水平还有所提高。虽然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无法解决，但是，他们还可以作某些调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达到激化的程度，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出现普遍革命的形势。*在当代世界，存在着一个共同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世界各国成为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立于这个整体之外。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交通、航天、电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缩小了世界各国在时间*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谁不加入这一市场，谁都要吃亏。任何国家经济的发展，都不是单靠国内力量所能完成的。

既然国际范围内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着两种制度，一个共同市场，既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为什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内，就不能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而让香港、台湾保留资本主义制度，让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利用这个最*整个国际局势的缓和，为和平解决海峡两岸的分裂和对抗提供了外部条件。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和改变阻挠中国和平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政策，为使大陆与台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的统一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拒和政策也形成了一定的*

“一国两制”下能共同繁荣吗？实行“一国两制”，不仅符合大陆人民和台港澳同胞热切希望祖国统一和繁荣富强的愿望，而且能够有力地促进台港澳地区经济的稳定与繁荣，有助于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和平竞赛和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目前，中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中国就摆脱不了贫困与落后的地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可能充分显示出来。其他一切工作都要紧紧围绕这一个中心，服务这个中心，决不能冲击和干*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完成祖国和平统一，不仅不会干扰和冲击大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且能够有力地促进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行“一国两制”，有助于发展和完善中国大陆经济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了以往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抛弃了过去闭关自守的局面，大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逐步形成了从内向外呈辐射形的三个层次。

辽阔的社会主义内陆经济区；14个港口城市，长江、珠江、闽南三个三角地带，海南；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三个层次的划分是根据其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情*按照“一国两制”，港、台、澳地区与祖国大陆实现和平统一后，则可形成对外开放的第四个层次。港、澳、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又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就能使大

进一步参加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扩大开放的领域，*实行“一国两制”，有助于发展祖国大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港、澳、台地区相比较，大陆的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还相差很远，实行“一国两制”，对于祖国大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香港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贸易中心，是我国获取外汇的重要来源之一。外汇收入是一个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培养出国留学人才，这些都必须支出外汇，目前，中国大陆外汇储备并不富裕，通过香港吸收这笔巨*香港是中国通向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大转口港，是大陆进出口的传统门户。香港是中国联系世界经济贸易市场的纽带。通过它，我们可以加强同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也可以同那些没有直接经济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扩大对外经济往来的渠道。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城市，是中国观察世界经济动向的窗口。通过香港，可以广泛而及时地收集世界市场的信息资料，为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服务。

香港是中国引进先进科技和设备的桥梁。通过香港，可以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打破一些国家对我国进口技术的限制。香港还可以作为中国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的基地，可以造就一批谙熟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一定管理才干的人才。

总之，由于香港所具有的这些特殊条件和作用，它的优势是国内其他大城市难以取代的。实行“一国两制”，充分利用香港的经济优势，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台湾同香港一样地处太平洋地区的中心，随着太平洋经济圈的崛起，台湾在世界上的经济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随着台湾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实现，台湾对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实行“一国两制”，港、澳、台的资本主义会挤垮大陆的社会主义吗？在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占着主导地位。港、澳、台尽管经济比大陆发达，它们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但也不会挤垮大陆社会主义制度。大陆人口是台、港、澳人口总和的 50 倍。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澳门，其经济资源和经济潜力都是无法与大*实行“一国两制”，不仅有益于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对港、澳、台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能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有些人只看到了前者而看不到后者，认为只是大陆获得了利益，这是不正确的。

从香港的情况来看，香港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决定了它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大陆的支援。香港紧靠大陆，缺乏原料与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陆一直对香港实行特殊的政策，以优惠的价格向香港提供了大量主副食品、日用必需品、淡水、工业原料*广阔的祖国大陆是香港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可靠保证，这种作用在实现“一国两制”以后会更加显著。

从台湾的情况看，实行“一国两制”也有益于台湾地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台湾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也存在着许多难题。由于台湾孤悬海外，资源匮乏，市场和投资场所不足，决定了台湾经济基本上是出口加工型。台湾经济贸易容易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尤其是对美日

经济依赖过大，近年来，由于台湾对美贸易出超*除了同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之外，台湾经济内部也存在着许多隐患。从近期情况看，由于台湾政治上信心危机加剧和投资意愿低落等因素，再加上长期偏重出口等，使台湾经济出现了。一连串失衡现象，一方面，存多贷少，储备过剩，投资不足，进口衰退，出超猛*大陆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较低，但也存在着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大陆资源丰富，原材料价格低廉，有着广阔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目前面临资金不足，劳动力过剩等困难，正与台湾经济相互反差。因此，大陆经济与台湾经济，恰好可起到相互补充相互支援的作用。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还可以使海峡两岸化干戈为玉帛，避免因军事对峙而可能发生的战争，同时也可以减少许多因对峙而导致的军费上的大量开支，卸掉这个沉重包袱。

实行“一国两制”，加强台湾海峡两岸的合作与交流，能够促进两岸的共同繁荣。

第三章 香港与澳门问题

香港与澳门，中国南部的小岛。

葡萄牙人没有想到通过贿赂就可以得到广东地方官员的默许，停留在那里，一住就是几百年；香港被英国占领后，澳门也被葡萄牙“合法”占去；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葡萄牙政府也同意在 1999 年把澳门归还中国。

香港、澳门本世纪都将回归祖国。

解决港、澳问题的关键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英国政府在 19 世纪同情政府签订了 3 个不平等条约，先后强占和“租借”了整个香港地区，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

澳门问题和香港问题类似，但早于香港。

澳门位于珠江三角洲南端，毗连广东省珠海市，与香港相距仅 20 公里。

澳门由澳门岛、氹仔岛和路环岛三部分组成，总面积为 16.143 平方公里，人口 40 多万，其中 97% 以上是中国居民，在澳门长期定居的葡萄牙后裔只有：万人左右。

澳门原属广东省香山县管辖，又称香山澳、濠境澳、濠境、濠江、马交，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16 世纪初，还是个小渔村。随着明末对外贸易的发展，东南亚、南洋各国的商船陆续亦这一地区进行贸易，1517 年，葡萄牙人以进贡为名来到广东，因无文书证明，中国皇帝不予接见。但这些人拒绝回去，便开始在这一地区进行贸易和贩卖活动。1535 年，葡萄牙人通过贿赂广东地方官吏，得以在澳门正式定居，但他们要向中国当局缴纳地租和税款。

1840 年布澳门为“自由港”，任命葡“兵头”为总督，拒绝再向当地政府缴纳租税。

1849 年 1887 里斯本交涉鸦片走私的机会，迫使清政府先后在里斯本和北京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北京条约》，其中确认“葡国永驻管理

澳门以及澳属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此后，1951 在葡萄牙管辖下的特殊地区。

从香港、澳门的历史上可以看出，香港、澳门问题的实质是英国和葡萄牙当局攫取中国主权的行为。

因此，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收回被占领的国土，是恢复行使中国主权，维护祖国统一。

这是天经地义的。

对此，中国历届政府都是明确的，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都没有承认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对香港和澳门的永久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政府曾多次阐明对香港问题的严正立场，指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受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朝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中国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恢复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

至于澳门问题，葡萄牙政府早有松动。1976 年，葡萄牙政府宣布澳门葡萄牙管理下的一个“特殊地区”时，就撤走了驻澳门的 5000 名守备部队。1979 年中葡建交时，双方就澳门问题达成了原则的谅解。葡萄牙政府明确承认，澳门是它治理下的中国领土，归还的时间和*必须指出，香港、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外国入侵中国领土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

1972 重申了这一立场，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联合国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也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该委员会的报告，被第二十七届联大批准。

这样，就排除了任何国际组织插入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可能性，借口非殖民化，搞什么“独立”“共管”“托管”。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而努力奋斗。

实现祖国统一，圆满地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

我党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成熟收回香港主权，实现祖国统一，洗刷 150 年来的民族耻辱，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这个愿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付诸实施的。

早在 1949 年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提出，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本着这一立场，中国政府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和平解决了边界问题，对待香港、澳门问题也是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香港、澳门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 19 世纪外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将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

中国政府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还在继续，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的徘徊。这种局势当然也不是适当的时机。

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如果过早地提出收回香港问题，就会打乱我国的战略部署，甚至有可能引起国际冲突。这样，就会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和平国际环境。反之，在这段长达 30 多年的时间内，我国不但建

立了大陆内地与香港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通*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逐渐趋于成熟。

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于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对外对内开放政策的实施，各个领域有步骤的进行，国内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整个国民经济·走上了协调而稳步发展的轨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以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为标志，解决台湾问题，消除海峡两岸的对峙状态，已由中美关系转为纯属中国的内政，美国在《上海公报》中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台湾问题的性质不同于香港、澳门问题，但是，在台*随着 1997 年历史期限的逼近，英国统治“新界”的历史根据已不复存在，从而使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处于被动地位。如果它要继续统治香港，它在国际上就得不到同情和支持。而这时我国已同世界上 13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收回香港主权的主张能够得到世界上解决香港问题，必须保持香港的继续繁荣和稳定，保持香港在国际经济上的地位。在这点上，中国和英国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中国和美国、日本、联邦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利害关系也是相同的，因为它们在香港都有重大的投资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2 年 7 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试探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和程序。

事实上，从 1979 年以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许多英国人士如希思、麦理浩、艾金斯等人时，都曾谈到香港问题，说明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立场，建议英方研究叶剑英委员长 1981 年宣布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

1982 方就如何解决香港问题交换了意见。麦理浩表示接受九条方针的基本原则。

一切情况说明，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完全成熟了。

用什么方式解决香港问题？首先是邓小平反复考虑，决定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统一主权国家的前提下，祖国大陆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保留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变：尚种未同的社会制度春统一的主权国家中和平均处，共同繁荣*以 1982 年 9 月中英双方领导人会见为转机，两国政府代表团经过 22 轮慎重的耐心的谈判，终于在 1984 年 12 月 19 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当然，这里不应当忽略的是，英国政府领导人在解决香港问题上，明智的主张占了上风。这也是中英两国顺利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

1982 的原则和程序，并且达成了通过谈判并以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目的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

1983 从而为中英双方的正式谈判扫除了障碍。

1983 判，从而使谈判纳入正确的轨道。

1984 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英国一些有影响和地位的政治家如杰弗里·豪、希思、麦里浩等，对于推动香港问题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都作出了贡献。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把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时间定在1997年7月1日，并不意味着中国承认历史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个不平等条约。

按照“新界”99年租借期这一历史期限，不管英国对待三个条约的立场如何，它必须如期交还“新界”，而交还“新界”的同时，就必须交还香港和九龙。

从中国立场来说，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整个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一律收回主权。

从英国立场来说，因为“新界”占香港地区的99%，工业区、电力、自来水、海陆运输设备都在“新界”，香港岛和九龙离开“新界”，根本无法存在，这个事实迫使英国政府不能不从整体上认真对待中国收回整个香港地区的主张。

在1997年这个历史期限上，英国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就是说它不能逃避交还全部香港地区的历史责任。正是由于有这个历史期限，有利于中英两国本着互相合作互谅互让的精神进行和平谈判并达成协议。

中国不可能把收回香港主权放到1997年之后，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坚决不承认三个平等条约，在香港的主权问题上不能谈判，也不能让步。如期收回新界，就必须同时收回香港岛和九龙区。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没有任何让步的余地，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主权不能迟于1997年。中国也不可能比1997年这个历史期限更早收回香港，除非1997年以前香港发生大的动乱，英国在过渡时期不能保证香港局势的稳定，中国会考虑接管的时间和方式，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正是为了在中英友好合作的基础上，顺利地渡过过渡时期。这也是中英两国政府从*《联合声明》没有表述废除三个不平等条约的用语，是为了避开在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上双方不同的立场。而具体规定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把香港地区交还中国，这就从事实上废除了历史上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这也是这个协议采取《联合*一个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一个在收回香港以后一定要继续保持它的繁荣和稳定，这是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根本原则。

香港问题达成协议后，解决澳门问题水到渠成。

本来，解决澳门问题在中葡两国正式谈判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因为早在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时就达成了澳门归还中国的谅解。

1984年席访问了葡萄牙，中葡两国领导人就澳门问题交换了意见。

1985年进行了友好磋商。双方认为条件、时机完全成熟，同意在1988年上半年在北京正式举行谈判。

由于有了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澳门问题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中葡两国政府代表团经过四轮谈判，便于1987年3月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经过22轮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5月换文生效。中国政府宣布1997年7月1日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香港这一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获得了圆满解决。1990年《基本法（草案）》，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和区徽。4月4日，正式通过，自1997年1月1日起，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它是按照“一国两制”方案获得圆满

满解决的。

如果说香港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一国两制”是作为构想题出的话，那么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就使“一国两制”从构想变为了现实。

“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客观分析中国、英国、香港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而是科学的，是切实可行的。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要坚定不移地恢复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要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要保持香港作为自由港、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就要找到一条能为中国大陆、香港、英国三方都能接受并为国际舆论理解的办法。

这一办法只能是“一国两制”，别的办法都行不通。

大陆和香港尽管政治观点、意识形态、经济制度不同，但在爱祖国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中国人民，包括香港同胞，都热烈地拥护“一国两制”的原则，希望有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

1997“一国两制”以祖国统一为重，突破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国家内不能并存的观念，实行求大同，存小异，成为解决香港问题的妥善办法。

“一国两制”为中英两国顺利解决香港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香港经济继续发展，也可以看出“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事实说明，“一国两制”圆满解决了香港问题，对稳定香港的局势，保持香港的继续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国两制”深得人心，初步显示了它的作用和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会证明“一国两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国两制”是为解决台湾问题、香港和澳门问题而提出来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国和平统一。

1997年对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产生直接的影响，对早日结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分裂局面，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必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港人治港”40的口号，以改革香港的民主制度。这一口号，要求香港在英国主权下实行“香港自治”，实行“港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治理自己的家园”。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再加上港英政府的压制，“港人治港”只是一种民间意见而已。

80 香港？这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对香港民间的民主回归派关于“港人治港”的要求和呼声中国政府表示理解和支持。

“港人治港”是香港自治的核心，没有港人自己管理香港，也就谈不上香港自治。

但是，如何理解“港人治港”呢？首先，必须弄清楚“港人”的涵义，其次才是如何“治港”的问题。

“港人”这一概念如何界定？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邓小平说：“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

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减心诚*邓小平的这番谈话，提出了“以尊重自己民族”、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爱国者”，作为治港港入的界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以居住权为出发点，以居住时间为根据，对港人作了法律界定。《基本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简称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港人”的界定和“港人如何代替英人而治理香港”，实际上已成为既定事实，因为港人代替英人而治理香港，已在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界定。

“治港”这一概念应当是广义的，而不是现在出台的制度所涉及的“政治”“法治”等方面，而应当是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各个方面。

“港人治港”最关键的是“港人”如何应付香港的位置重组而造成的交替技术真空。所谓“技术真空”，是由于在英国统治香港时期，由英国人占据香港运转关键环节而使港人无法得到相应的治理香港的技能。这主要表现为民主政治意识的缺乏，经济管理人才、技术*“港人治港”基本上在制度上得到了保证。问题是“港人”是否有能力管理香港，是否有足够的人才管理香港。

也就是说，“港人治港”无疑要由港人来治理香港，但同时“港人治港”也要求港人有能力治理香港。如果管理主体缺乏，那就必然导致主体空缺的问题，所谓“港人治港”也就会因为英国或大陆人士弥补空缺而成为一句空话。

在香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使港人对于移民国外趋之若鹜，造成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危机，所以，“港人治港”涉及到人才资源问题。

香港人才外流的原因较为复杂，具体说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内在因素方面。包括港人对政治前途的忧虑，对经济利益的预期，以及港英政府对香港人才外流采取一种漠然置之的态度，在很多时候港英当局因受英人支配而采取某种鼓动方式。二是外在因素方面，即*90心。

香港人力资源由于各种原因而造成的严重不足，是否会威胁到“港人治港”自治制度的推行？“港人治港”的实质，就是由港人自己把握高层运作，自己掌握香港经济、政治、文化决策，把握自己的命运。因此，“港人治港”关键的是用港人在高层运转方面代替英人，这就涉及到香港是否具有足够的有决策能力、管理能力的人力资源。

公务员的短缺是一个严重问题，行政人员的流失率高达 20% 之多，这就需要大量人员加以填补，而填补人员必须具有以下素质：第一，严格的政治训练。政治民主意识是管理民主政治所必须的。第二，严格的业务训练。高层运作人士不但要求其知识面广，而且要精，**香港是否能提供足够的这方面的人才？首先，人口结构老龄化严重决定了中年有知识和有经验的人口比例很少。在香港人口结构中呈现两极分化，老和少两极并存。其次，港人年长者缺乏严格的政治训练，民主思想意识不浓，参政议政的素质不高。这与以往香港的政*从实质上看，香港人才市场的结构和状况，严重威胁到“港人治港”的高层运作转化。

人才的短缺，一方面制约香港经济自身良好地运作，另一方面制约其向外扩张，寻找发展出路的机会。

如何解决香港人力资源的危机？根据正视现实及对未来进行合理预测的原则，现在有一个较为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包括短期行动计划和长

期行动计划。

香港人力资源的危机，一是来自历史沉积原因如生育周期因素，二是来自近 20 年的人才外流。因此，短期的首要问题是扼制人才外流，吸引人才回流。

产生人才外流的基本原因，主要是对中国政府的误解，对西方国家的不了解而盲目移民，还有对香港优势的无视。因此，在近期内要加强各方面的宣传。要让港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策，明白中国政府的诚意。要让港人了解香港的优越性，出走他乡的弊端，改变*解决人才危机近期的最佳方案、是采取吸引人才回流的政策，人才回流目前存在着许多障碍，如原有人才的工作岗位被占；香港地价飞涨，港人回港后买不起住房。因此，吸引人才回流首先要做到的是扫除人才回流的障碍，为回流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就业环境，其次*作为解决香港人才不足的近期措施，还要采取部分招引港外人才，其方式应当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规定的“外国人可以以个人身份受属于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可以聘请外国人做顾问，以及有外国居民权的人可以在《基本法》所指定的位置上担任职务。要根本解决香港人力资源的不足，必须实施长期行动计划。所谓长期行动计划，是指通过长期人才资源投资，改变人力资源的质量和结构，从而从长远来适应香港对人才的需求。

在香港，基础教育比较健全，从幼稚园到中学，其人口数量比是非常合适的。但是由于香港原来依附于英国，高等教育很多是由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代替进行，从而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香港只有 5 所初具规模的大学，这同香港总人口和经济发展是极不适应的。因此要改变香港人才资源的质量和结构，还必须改善教育培养途径。以往，港英政府实行非干预政策而使教育途径单一化。以后，香港特区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职能优势，进行多途径的教育方式，可以采取政府开办职业培训方式，提高在职人员的素质。同时，可以采取与*不难看出，这种方案遵循了“港人治港”的基本原则，较好地解决了香港的人力资源危机。而解决了香港的人力资源问题，“港人”才能够自己管理香港。“港人治港”不致流于一句空话。

只要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努力想办法克服各种困难，“港人治港”一定会使香港保持稳定和繁荣。

港入心态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前后，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抱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很多，随着《联合声明》的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出台，1997 年香港回归日近，香港人对*港英政府的许多官员、议员，香港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士普遍表示乐观和欢迎。

香港的英资财团和他们的代言人表示欢迎。经过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长时间的谈判，他们看清了中国政府搞“一国两制”是诚心诚意的。中国领导人不仅在各种场合讲得很清楚，而巨在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写得很详细很具体，并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中华*一些反映港英观点和愿望的资产阶级学者、报人也很高兴，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形势有自己的估计，一位教授连续发表文章赞扬中国的体制改革对实行“一国两制”有利。香港的工人也都觉得“一国两制”好。有个老工人说：“这步棋走得高，一下子就把全局搞活了。”*“一国两制”的决策考虑到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因而受到各方面的一致拥护。从目前来看，怀疑、反对的声音已经渐小，但并不是没

有了，更深的怀疑依然存在。

一家报纸的总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50年不变，现在看来，共产党是真心要实行的，但行不行得通，还很难说。“一国两制”会坚持多久，谁能保证？这个报人的怀疑，反映了香港一些知识分子还有很深的疑虑。

香港人是讲实际的。看问题不能离开实际。

现在中国大陆的实际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是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简单说来，第一是搞社会主义，第二是有中国特色的。“一国两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中国近代历史证明，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瓜分中国，不让中国致力于发展资本主义，迫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在中国这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要求不能超越阶段，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马列主义没有现成答案，国际上也没有过。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基*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基本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这条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国内安定团结的局面，需要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因*“一国两制”不是权宜之计或玩弄手法，而是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实行的一项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只有全面地看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才能正确理解中国大陆的发展方向。

大陆人看香港约占全国面积万分之一的香港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土的一部分；约占全国人口千分之五的香港居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从来没有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而动摇过这个正确的观点和信念。

1997 老人们清楚地记得，在建国前和初期，广州和香港之间是可以随便往来的，只是在上改、肃反开始后才智中断。

在大搞政治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后来发展到不分青红皂白，谁有“海外关系”，“港澳关系”，便难以在政治上予以信任，便值得怀疑。这个打击面就实在太大了，也是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

无可否认，有少数坏人利用香港作为活动基地，对新中国进行各种破坏，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整个香港地区和所有在香港的人都是“异类”。

事实上，中国大陆特别是广东省、海南省的好多市县，有“海外关系”“港澳关系”的家庭多得很，这种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办法不得人心，对国家建设也不利。

当时，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一方查入，一方禁出，非法出入曾使双方边境管理颇感为难。直到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这种情况才逐渐趋于正常。

过去的宣传报道不够实事求是，造成了大陆人民对香港的了解有片面性和神秘感。神秘感是从片面性中产生的，因为片面性不能令人信服。这主

要是指尽说香港的黑暗、糟糕、腐朽，几乎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就欠全面，以偏概全，没有做到恰如其分，反而令人存*但是，事情往往是过犹不及，各走极端也是成问题的。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常把香港描绘得美妙无比。这样同样不够实事求是。过去怕有点香港关系，现在有点香港关系似乎很神气。香港的许多东西都很好吃，就是不大像样的电视片，不大会唱的艺员，名不见经传的电影公司，也好像都成了宝贝，被捧上天，这甚至*香港有根多值得赞美之处，但也有不少连香港人也深感不满的地方。全面了解，正确对待，才是需要提倡的，应当还香港和香港人以本来的面目。

“香港人很有钱。”这必须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捐赠或投资以数千万港元计的，为数毕竟不大多。捐赠要完全出于自愿，不能有丝毫勉强。有协议或合同的，一定要严格遵守，实到专款专用，用得适当。我们善于使这些捐赠或投资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益*“在香港容易发达。”这是表面地看问题，必须由表及里。发达可能较多地指发财，可财有不义之财，也有正当劳动和经营所得，前者不仅非法，而且伤天害理，为人所不齿；后者也得来不易，需要辛勤劳动和工作，还要承担风险。对香港社会有了解的人，大都知道*“我们要学香港。”这要看学什么，不能笼统地这么说。诚然，香港有不少值得我们参考的借鉴的经验，但也不宜照搬照套，特别是那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东西。至于低级趣味、颓废、消极、阴暗、腐朽的东西，连正直的香港人也唾弃之。这就是说，香港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有香港的代表和委员，为什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只有香港的永久性居民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什么没有财政上缴任务？”“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什么有独立的司法制度和终审权？”“香港同胞持回乡证可以随时进出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内地人民为什么不能像到上海、广州一样去香港？”诸如此类的议论，在大陆人民中间是不少的。大家议论纷纷，这应该说是好事，比保持沉默和漠不关心可喜得多。有问题提出来得到解决，无论如何总比只是纳闷令人心情舒畅。

其实，以上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对“一国两制”的论述中早已阐明了。

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状，中国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实行“一国两制”，于是有高度自治，有“基本法”。特别行政区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否则就不叫特别行政区了。

高度自治不是独立。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国防外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基本法，任命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悬挂国旗国徽，必要时用“中国香港”名义等，都体现了“一国”即统一的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度自治属于“两制”问题，是以“一国”*

’97香港回归之后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在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形？香港与祖国大陆的关系怎样？香港回归有什么影响？1998 随着1997年香港的回归，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这样，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侵略被宰割的历史污点就将洗去，民族的耻辱被祖国统一的光辉业绩所取代。这种使长期被肢解的祖国领土的统一，被分离的同胞骨肉团圆在五星红旗下结局，必然对香港人民、对祖

国大陆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子孙产生巨大的影响。1998 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样的特别行政区域，既不同于非殖民化后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又不同于联邦制国家中的一个邦。它是单一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一个特殊*香港特别行政区，一方面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一方面享有《基本法》规定的高度自治的权力，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港人治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基本法》有关规定组成，中央不会派出官员管治香港，中央各部委各省市*1998 香港将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彼此分立，互相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可以防止权力滥用，保障人民的自由，这是一种崭新的格局非香港现行政制所能比拟。

自香港沦入英国统治之后，由于英国当局的控制，香港总督实际就是香港政治生活中的“一家之主”，独揽大权于一身，而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均须向总督负责。

1997 政府、负责执行香港各种法律，决定政府政策和发布行政命令，任命政府官员等；特区政府权力则来自特区立法会，其权力范围是制定法律、审核政府的财政预算、批准税收和公共*当然，香港的这种“三权分立”政制，在某些方面又与西方一些“三权分立”的国家不尽相同。

首先，它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自治政权，而不是一个国家，因此行政区的权力不是来自国家主权，而来自地方分权，即中央把一部分国家权力移交给香港特别行政区。而外交国防事务，由于属中央直接管理，香港就无权处理。另外，在某些情况下，三种权力的行使，不*其次，香港的“三权分立”是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而西方一些国家则以立法权力为中心，由议会组织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三权中相对比较突出，权力很大，其产生不经立法会，又可以解散立法会，还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任免法官。立法会虽然可以弹劾*1998 而保留有利于香港繁荣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

1997 这一天，中国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而英国则于同一时间将香港交还中国。到时候，英国统治者撤走，殖民主义制度被废除。这是 1998 年“一国两制”下新香港的重要特点。

1998 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作为主权的体现和象征的东西变了，殖民因素被消除。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成为香港地区宪法性的最高法律，取代英国对香港进行长期殖民统治的根本法《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由《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基本方针政策。中国的五星红旗升上去，英国的米字旗降落下来，新的特区区旗、区徽取代旧的港旗、港徽。

由港人推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行政长官取代由英皇委派的总督。中国人民解放军取代驻港英军。防务权和外交权，从伦敦转到北京。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审判机关主要长官，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改变过去主要由英人担任的*1997 殖民主义制度，这就消除了中国与殖民主义的矛盾，解决了中英之间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悬案，使得香港不仅在历史上、在地理上是中国的固定领土，在现实中也完全回到祖国怀抱。这是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进展。

1998 而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最根本的是保持其经济制度不变，具体来说，就是要保留原有的私有经济制度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香

港的经济大部分是私有经济，又是自由港基础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最自由的最开放的经济。这两者是*香港保留的经济制度，不是欧美或任何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同香港密切相连的香港独有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

香港回归之后的 1998 年，香港现有的一套经济管理方法，因为适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对香港繁荣关系很大，仍将继续维持它的核心部分，是“积极不干预”的决策原则，以及在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下的“全面开放的自由港政策”和自由竞争条件。

香港目前的“以外贸为主导的多功能的国际市场经济结构”，是香港本身无资源、市场狭义、地理位置优越和一系列其他国际因素造成的，这是香港地区性经济的特点和优点，是香港经济繁荣的关键之一。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需要维持。

收口香港后的 1998 年，要全力维护香港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机制，保持香港的国际城市性质。为此，必须限制垄断，使一切资本都能够在平等、合法的条件下自由竞争，促进香港进一步繁荣稳定。

1997 景暗淡，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成绩显著，亚洲地区经济持续上升。这种形势既为香港提供了新的有利机遇，也将给香港经济带来新的困难，必须在不利和有利之间，掌握中国经济振*随着香港的回归，香港和大陆问原来就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会更加密切。香港回归以后，香港与大陆将成为一个国家内分别实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地区。在统一的国家内，将更有利于香港依托大陆丰富的资源、便宜的劳务、广大的市场，也使大陆社会主义*香港地区历来是中国进出口贸易最重要的地区。作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最大口岸，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和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波动，对香港常常造成严重威胁*大陆和香港虽然实行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毕竟是一个国家，是休戚相关的。就发展经济来说，大陆有大陆的优势，香港有香港的优势。香港圆归之后，可以更好地把两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共同繁荣。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从经济上讲就是既保持双方原有制度的区别，保持彼此的独立性，同时又解决大陆和香港之间原来由主权分属必然带来的种种限制和不便。

大陆与香港的经济水平，目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这种差距会在双方的经济发展中逐渐接近，存在着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港，它在当代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发展中，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在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交往中，由于种种原因，反而存在许多障碍。随着主权的统一，更加密切的联系，对香港的发展和大陆的发展都有利*随着 1997 年香港的回归，大陆与香港在不同的制度下仍将充分自主的发展，而不是谁强迫谁、谁改造谁的关系。

决定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先进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最大限度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是在几百年的发展形成的，面对自由经济存在的种种弊端，资本主义各国近年来也在吸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些管理方法。

“一国两制”实现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实行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将有利于两种制度的相互了解。两种制度并存，将有利于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中吸收其他经济成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从而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和繁荣。1998 香港回归祖国后，它作为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不会改变，这方面的机制将继续得到正常的运转。这一方面是由于香港自由发展的需要，因为香港一部分市场在西方，技术来源、经营管理方式也来自西方，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可以预计，香港回归之后，由于香港有大陆的支持等诸多优越条件，有资源和市场的保证，它作为国际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难以取代的。

两种制度是香港稳定繁荣的两个源头，香港从社会主义祖国的特殊政策中取得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充沛的活力。在香港回归之后，香港发挥联结“两制”的桥梁的作用。祖国大陆和香港将通力合作，共同繁荣。

“一国两制”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开辟了坦途，同时也为国际社会解决历史遗留的各种矛盾和争端找到了新的出路，必然会对人类的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1998

第四章 香港奇迹——经济腾飞的奥秘

香港，一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南海小渔村，成为当今世界开放的、多功能的自由港。

维多利亚港，号称世界三大优良天然深水港之一，给香港的繁荣带来了良好的条件。

市场经济政策给香港经济腾飞注入了活力。

香港，亚洲“四小龙”之一，被称为“东方之珠”。

它的成功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本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大量的先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生产和经营管理方法先后传入了香港，这些现代化的东西首先使香港经济向现代化多元化方向更快地发展。香港经济的现代化又引起了香港社会、港人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促使香港整体向现代化发展。由于香港土地狭窄，资源缺乏，50 年代以前，香港只是依靠优越的地理条件，发展成为一个转口港，转口贸易的发展为香港新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坚实的基础。60 年代，香港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的兴盛时期，转口港变成了制造业中心，香港新城市建设开始起步，一切都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70 年代随着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香港工业生产从过去的低档、“劳动密集型”向高档、“技术密集型”逐步转变。五六十年代香港工业的“重臣”纺织业和 80 年代香港历来受英资财团控制，经过 100 多年的经营，英资财团实力雄厚，在港投资总额在 70 年代时就有 600 亿港元，比美资高出两倍，比日资高出三倍。英资财团跻身于行政、立法两局之“九”。“九龙仓收购”是第一次华资、英资大较量。李嘉诚，人称香港“地王”，他不满足于现有成就，他的目标是要使华资在香港成为主要经济势力，气魄宏大。1978 年初，李嘉诚

开始逐步收购英资九龙仓的股票，从每股 10 多元一直买到 30 多元，到 1978 年 9 月，他已买足了本世纪 70 年代的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已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早在 1980 年，香港年生产总值为 1060 亿港元，人均产值为 20933 港元（约合 4080 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而高于新加坡。由于经济的发展，香港成为一个繁荣而富庶的城市，摩天大楼和豪华公寓普注视今日香港的繁荣和富庶，面对今日香港年人均：万多美元的生产总值和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我们不禁要问：创造香港经济繁荣奇迹的秘密是什么？1. 地利——几乎是坐享其成打开中国地图，注目中国的东部沿海，有人说这是一 s 型的经济龙脉：从辽宁南下，经过京津冀鲁而及于江浙沪和闽粤桂琼，到北部湾沿海地带，其形恰如英文字母已在 s 的有下侧有三个闪光点，一是香港，二是台湾，三是海南，台湾和海南是中国这条巨龙的左右眼*香港地处亚大地区的核心，居于北京——印尼纵线和东京——印度横线的交汇中心，因其维多利亚港是世界三大优良天然深水港之一，而成为世界航道要冲，成为欧美、日本进入南中国海的最重要门户。在香港特殊的经济地理位置形成的过程中，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香港背靠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给它以强大的后盾和有利的保护。中国是世界上最广大、最有潜力的市场，国际上有远见的投资者都不能忽视这个市场，而要使资金和商品打入中国市场，香港须是最好的桥梁和跳板，加之香港和中国大陆特殊的亲情关系，这是香港的其*香港经济发展，人口激增，土地资源日益稀少，其经济利益愈加高涨。根据 19 世纪中英不平等条约，英国割占香港、九龙，并从中国租借新界 99 年，由此形成了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的土地界域。根据英国的法律，英国本土土地除少数皇室邑外，皆属民间私有，土*37 亿港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 10.1%。该比重每年度上升幅度较大，其中 1980~1981 年度高达 35.6%。售地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率如此之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少见的。

香港房地产业与其他产业是不可分离相互依赖的，房地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但是地价、楼价、租金香港旅游业兴起于 5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国家经济迅速发展，香港的经济结构也由转口贸易向加工贸易发展，刺激了香港的社会繁荣，奠定了香港旅游业的基础。60 年代香港旅游业进入大发展时期，80 年代旅游业进入发展新阶段，*香港加工贸易型制造业是香港经济的一个主要支柱。1984 年，制造业生产总值占香港生产总值的 24.1%，1988 年占 20.4%，1992 年占 13.2%。虽然制造业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因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内地所致，但它的产品的 80% 销往世界 160 多个国家，1993 到 60% 以上。香港的加工贸易型制造业之所以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产业，并非是由港英政府或某个权威机构预先设想规划出来的，而是香港工业界根据自身的特殊条件在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香*当人类社会进入崭新的信息时代的时候，香港也在加快着信息化的步伐，先进的信息科技正在香港的许多行业得到应用，从事信息工作的人员在各部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香港的信息产业大体上可分为开发信息资源、提供信息服务机构、信息传播媒介、信息*香港的交通运输由对内和对外两部分组成，其中对外运输是这个远东自由港的大动脉，而对内运输则是保证香港正常运转的枢纽。香港的交通运输业是与香港经济的腾飞同步发展的。到目前，香港已成为一个著名的国际航运、航空中心，有着连接世界各大洲许多地*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商港，是世界的

三大优良港口之一，它已与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60 多个港口有航运往来，形成了一个以香港为枢纽，航线通达五大洲三大洋的完善的海上运输网络。从香港到世界各地有 19 条主要航线，每一条主要航线都有多家轮船公司派*香港还是世界上最繁忙但操作效率最高的国际航空港之一，它对香港成为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制造业中心和旅游业中心起了主要作用。香港启德机场是世界上面积较小而设备最完善、操作效率最高的国际机场之一，现有 38 家航空公司使用该机场，每周提供 720 京九铁路和港粤公路作为连接香港与内地陆路交通的两条大动脉，同海、空运输相结合，加强了两地之间的联系，对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优越而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香港以“天生丽质”，不可比拟的地利是香港经济腾飞的基础条件，与地利有关的产业的迅速发展并相互促进，繁荣了香港的整个经济。2. 贸易自由的厚爱中国在 18、19 世纪同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日益频繁，英国看中了可以进入中国腹地的香港作为他在中国市场销售鸦片和从事其它贸易活动的踏脚石。当英国看到香港地小、资源少、生活用品依赖性强、交通不便、运输落后时，只好在香港实行自由港政策，允许商品进*香港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一是市场自由，二是减少政府干预。香港经济从 50 年代开始腾飞。实现由转口港到以制造业为中心，进入了工业化历史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科技革命带来新的生产力，促进各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60 年代以后，出现和*香港开埠早期，只有转口贸易和少量为转口贸易、航运服务的小工厂。50 年代发展加工制造业以后，所需要的生产设备和原材料都靠外地供给，产品主要外销，无须利用海关来保护本港工业。在经济多元化发展过程中，香港的工商业和其他行业都吸引了大量外来的资*当今香港的自由港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 贸易自由。战后 40 多年来，香港对进出口有形贸易基本上没有管制，对本地厂商出口商品，不提供任何优惠和特权，对进口商品也不设置关税壁垒。香港的无形贸易包括人口航运、空运、旅游、外国使用港口、机香港经济的繁荣说到底“资本的繁荣”。香港的繁荣除了香港人的创造性劳动外，主要是缘于多国多方资本在这里荟萃、竞争和有效运作。资本输出之初主要是少数拥有“剩余”资本的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的输出，以取得高额利滑，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发达国*不同制度的社会有适应其经济制度的不同产权形式。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其资本增值率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地区都高、活力都强，这与它的特殊的产权形式有密切的关系。

香港的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是沿用英国法律确认某些人对某些资产的某些权利。它有三*(1) 产权私有化。其私有化的范围很广，资本主要有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形式。基于所有权基础上的占有权、生产经营权、分配权、享用权、转让权甚至毁灭权都归个人。尽管社会资本及其企业的产权关系比较复杂，但本质上仍是私人资产，因为股权分别为私人所有。(2) 私有产权香港经济是典型的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是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让各种生产要素形成最佳结合，发挥最大的经济效能。由于香港地小、资源少，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对香港来讲，尤为重要。香港主要是通过市场做到了从世界市场上调集香港所需要*香港的市场体系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培育，其内在结构比较合理完善。从香港经济的投入、产出的角度，揭示香港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市场运作的关系，可以将香港市场体系的基本结构划分为两个方面的五个市场，即属于投入方面的三个生产要素--

-资本、土地和劳动香港要素市场主要由资本、劳力、土地三种商品市场构成，其资他源都受这三大市场要素的配置所带动。一般认为目前香港的技术市场尚未成熟，信息市场也只是刚刚兴起。香港的资金市场居三大要素市场之首，它是要素市场中最国际化、最现代化、起主导作用的市*劳力市场，也称作人力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它主要包括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工市场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专业、管理人才市场。香港的劳力市场实行自由雇佣劳动制度，政府极少干预。雇主有选择雇员、自行决定工资形式以及解雇雇员的自由，雇员则有选*土地市场具有鲜明的特点。香港地区土地资源少，可供发展的土地有限，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香港经济的运作和发展，但它仍是一个成熟的要素市场。香港土地市场的唯一供方是港府，土地的投入量由政府有计划地直接控制，土地成交价则通过拍卖的方式确定，地*三十成熟的要素市场促成了产出方面的两个商品市场的繁荣兴旺，而商品市场的兴旺又推动着要素市场的发展。

香港的产品市场为香港和外地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实物商品，在香港诸市场中，其形成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国际联系最广，在市场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无论是从香港的地理环境看，还是从香港的资源条件看，香港最适宜于发展商业活动。香港的产品市场可以分为两*服务市场是劳动者通过劳动提供有一定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服务，形成服务商品，构成服务商品市场，即服务市场。香港的服务市场很发达，它所提供的是以直接的、具体的劳动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它依其服务对象的不同可分为生产服务市场和生活服务市场。香港*香港市场体系中买方市场发达、自由市场成熟、国际市场开放，为香港经济的腾飞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前提，并将随着香港的回归，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其经济功能。5. 竞争——经济腾飞的推动力竞争既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然产物，又是市场机制的重要规律，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竞争因素在香港市场中占主导地位。在香港市场中，竞争无处不在，但并未形成竞争的对立物一垄断，垄断因素只是表现在个别领域。充分自由的竞争保持了香港经济的活力。从香港居民家庭消费开支的各个主要项目考察，分析其市场类型，可以看出产品市场和服务*香港市场以竞争为主导，有利于市场机构功能的发挥。自由竞争迫使所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尽力去争取有利的产销条件，如提高技术，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质量，适应社会需要等，以争取较好的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在垄断因素较少的情况下，自由竞争呈现*自由竞争的机制大大激发了香港人的机智进取、冒险拼搏、勤奋创业的精神，人们比较自由地到处寻找机会，想尽办法开展竞争，创业赚钱。自由竞争激发了人的活力，人的才智的发挥创造了香港经济的繁荣。在以竞争为主导的条件下，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与此相*香港市场棚制、地理环境等因素固然是香港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因素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政府的维护和配合。这如通常人们所比喻的那样，市场经济两只手，一只是无形的手，即指市场机制的运行，一只是有形的手，即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为市场机制*香港政府最初奉行的是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依靠市场“无形之手”自发调节经济运行，很少动用“有形之手”。随着“无形之手”弊端的被认识，70年代起，香港政府转而坚持西方古典经济学中的“有限政府”原则，把政府的干预限定在“市场失败”*香港政府在致力于香港经济发展中，主要是做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是创设经

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保证市场机制正常运用；一方面是针对市场机制运行中出现的弊端或危机，进行宏观调控或直接干预。

香港政府创设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条件主要是：(1) 保护自由港地位，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一系列自由经济政策，营造自由贸易、自由通航、自由投资、自由经营、自由汇兑、自由进出、自由竞争的环境，为自由的市场机制运行顺利打下好的基础。如在建筑业方面，港府依据《建筑物条例》，严格实行分级分类管(2) 重视经济立法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为市场机制正常运作提供保障。在香港的成文法中，经济方面的立法约占 45%，构成了自由竞争的规则，保证了自由、公平、有序、高效、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如在房地产方面，1939 年港府制定了《城市规划条例》，70 年代(3) 提供市场机制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良好的“硬件”和“软件”。“硬件”包括兴建码头、机场、道路、隧道、通讯设施等，还建设了几个工业村。“软件”包括普及教育、培训劳工、提供咨询服务，等等。此外，香港政府的反贪肃贪工作之成效闻名于世，为经济的香港政府提供的这些基本条件显然不是要干预微观经济，而是要在宏观上提供一个适合于市场机制运作的环境，尽管同形势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不足之处，但它对香港的腾飞功不可没。

香港政府为保障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积极补救“无形之手”失灵对经济繁荣造成的危害。这方面最突出地表现在金融方面，如 1964 年银行挤兑风潮、1973 年股市暴跌之后的几年间，先设立银行管理制度、证券业监督组织、重组金融体系、建立金融三级制度。从 1980 市场自动调节机制与香港“有限政府”的“积极不干预”相互结合，使资本在市场这个大舞台上充分发挥其功能，“两只手”变成了“两支巨翼”推动着香港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7 香港经济正处于繁荣时期，随着 1997 年 7 月 1 日的迫近，中国政府关注香港的未来并为此进行着充分的准备工作，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充满信心、积极审慎的，保证并预示了未来之香港将继续繁荣，面对香港回归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关注的岂只中国政府和*(1) 海外目光中的香港未来香港即将口归之际，有人在美国《财富》杂志上发表题为《香港之死》的署名文章，耸人听闻地“判决”香港将走向死亡。然而鼠目寸光者毕竟是少数，登高望远者则枚不胜举。

法国《费加罗经济》周刊 1995 年 11 月 29 日发表文章《香港对未来充满信心》说：再过不到 600 天，香港就要口到中国的怀抱了，这块英属小领地继续大张旗鼓地平山丘、修公路、挖隧道、盖摩天大楼、填海、造地，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就好像 1997 全盖着小小在政府和工商界，连最乐观的人也知道，英国最大的殖民冒险的结束不可能只是简单地换换国旗而已。这是一种赌注：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经济能在共产党大国的统治下继续存在和繁荣吗？在纸上，一切，或几乎一切，都为保证 1997 年后香港的自治而作了明文规定，*在工商界，不管怎样，人们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仍是很大的。巴黎国民银行驻香港的负责人断言，“在未来的 20 年中，香港仍将是*中国最好的港口，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只能是加强，它的大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会很快就出现问题。”同上海竞争吗？巴黎荷兰银行驻港副总裁雅克·里尼诺断言，“上海还不是香港的真正对手。”在 1997 年后，中国的这个大城市要扮演内地金融中心的角色。实际上，香港人也相信北京将会让他们“经商”的。香港的许多外国投资者都赞成这一看法。他们认为*

美国《财富》杂志在 1995 年 6 月尽管有署名文章说香港将走向死亡，然而，据各项调查表明，随着 1997 年的临近，美国商人和投资者对香港未来的信心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美国著名投资公司“美林证券集团”于 1996 年 1 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按目前的趋势，香港将于 21 世纪的上半叶继续扮演“东亚纽约”的角色。“美林”对香港未来前途的评估在美商中极具代表性。

香港是美商在亚洲最大的经济活动基地之一。目前在港的美国公司已逾 1000 家，其中一半以上在港经营已逾 10 年，成立逾 20 年者占 1/3。七成的美国公司将其亚洲总部设在香港。此外有 44 家挂牌的美国公司及 27 家挂牌的美商保险公司以香港为基地。在目前外商直接投资香港是美国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为美国商品的第 11 大市场，每个香港市民平均每年要花费 1700 美元购买美国商品。美国也是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香港电子产品、服装及配饰等的最大市场，香港还是中美贸易的重要转口地。

香港美国商会的一项权威性调查表明：逾九成在港美商对未来 5 年香港的投资环境表示乐观，香港仍是大部分美国公司在亚洲设地区总部的首选地。美商对 1997 年以后的前景信心渐增。香港美国商会会长马败指出，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不构成美商在港投资的忧（2）近邻的言论振聋发聩新加坡，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其经济相当发达，与中国是友好近邻。李光耀，新加坡的前总理，人们十分熟悉的著名政治家，他非常关心和了解中国大陆地、台湾和港澳，也深谙英国的政治和港督的“把戏”。在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其施政报告中抛出所谓的制宪*针对香港有人鼓吹“民主抗中”或“民主拒共”的主张，李光耀曾告诫说：任何企图建立民主政制，作为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屏障，都不可行。港人不应在直选及民主的问题上与中国搞对抗。“无论北京怎样与英国取得协议，怎样签订条款，无论内容如何，中国仍*彭定康在无视中英两国联合声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英两国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对现行政制作了许多的重大的变动，急剧加快香港政制发展步伐。对此，李光耀十分怀疑，他说：推行民主改革和建立一个负责任政府，“新加坡就要长达 37 年的时间，现时*李光耀曾在英、美国学，但他在新加坡执政时，“所作的一切并没有抄袭英国或美国模式”。他说：“我并不同意西方社会科学的意见，一定要照单全收”，“我曾与很多亚洲国家领袖作单对单的谈话，我知道他们施政的方法，就是只取他们认为有用的部分。并非单*事实上，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之间也并不相互照搬对方的政策或模式，香港作为中国的领土，港人一向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任何一种西方的政治模式更不可强加于香港。否则，注定会导致香港的混乱和倒退。

（3）香港内地一条心 1991 了香港同胞的心，香港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踊跃捐助，并举行了一系列义演、义卖、义赛、义载活动，在一个多月时间内，筹集了近 7 亿港元的捐款以及大批物资转送灾区。香港为其次，香港社会各界对香港政治、经济前景看好，也是推动赈灾热潮的重要因素。在香港平稳过渡时期，香港社会人心向好，港人对“一国两制”必将得到贯彻实施持乐观的态度，对中国政府致力于香港繁荣稳定的方针政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一有利形势促进了各*总之，这次赈灾活动的成功，是香港全体爱国同胞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不仅从物质上支援了内地的抗灾自救，而且更加激励了灾区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斗志。赈灾的成功不仅使香港同胞感到

自豪，而且中国人都为之高兴和骄傲。赈灾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一国两制”的*（4）中国领导人胸有成竹，满怀信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认为在中国内地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前提和最大保障。他认为平稳过渡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关键环节，“一国两制”是既能维护中国主权又能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佳构想；“港人治港”江泽民同志作为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继承和发扬光大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治国战略思想，坚持“以我为主”，争取英方合作，他明确指出：“香港保持平稳过渡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从来没有把香港的稳定繁荣寄托在别人的身上。”1993年3月19日，他在会见香港1993年1月8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霍英东为团长的香港中华总商会代表团时说：“我对香港满怀信心。虽然有时会有急风骤雨，但总会雨过天晴。”他说，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来解决香港问题，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1996年采访时发表重要谈话，谈及香港问题时，他说，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现任港英立法局的产生，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违反了中英已达*1997年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将根据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组建。采取上述措施非但不会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正是为了香港的平稳过渡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有效运作。香港1997年后保持长期的繁荣稳定是有充分保证的。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谈到新闻自由时，江泽民指出，世界上任何新闻自由，都要受到法律约束，不可能有超越法律的绝对自由，1997年以后，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将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

江泽民强调指出，香港过去的繁荣，并不是像有人说的“归功于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新闻体系”，而主要是香港人民创造的，同时，也是与中国内地的支持及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分不开的。香港回归后，香港人民一定会以国家主人的新的精神面貌，创造一个更加繁荣*（5）花团锦簇的未来香港。回归后香港将继续成为经济城市呢，还是变为政治城市呢？在临近回归之即际，英国竭力把香港变为政治城市，即把香港变为国际政治角力的场所，更明确他讲，实质是想把香港变成中国的国际政治活动中心，使香港落入灾难之中。1994年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香港的价值，他说：“香港对于中国的价值，一直在于，将来还是在于它的经济价值。香港一直是一个经济城市，从来就不是政治城市。”香港只能一直是经济城市是由香港历史形成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第五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风雨如磐

香港，是一艘“漂流的船”吗？在“漂流的船”里袋满了金银！
这就是香港，继纽约、伦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
世界大资本集团，纷纷涌入香港，为香港的全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香港联交所吸引大批优秀的上市公司来港上市，国企H股也在港挂牌

上市。

'97 回归日近，“恒生指数”不断攀升，表明人们充满信心，香港能够继续保持昔日的繁荣。

中国承诺，97 后，香港将继续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时间里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香港金融业为之立下了汗马功劳。70 年代以来，香港金融业发展迅速，直追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而成为世界上金融机构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80 年代以来，香港一直是世界上除纽约、伦敦之外香港金融业的发展，与工业、贸易多元化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各行各业的发展需要金融业的支持，各行各业的发展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而金融业则有力地促进了整个香港经济的发展。金融业是经济生活的“中枢”，是其它各业发展的“维生素”。香港之所以能成为香港金融体系国际化不断增强，在香港开业的国际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从 70 年代以来不断增加。1969 年底，在外国和香港注册持牌的银行共有 73 家，分支行 288 家，外国银行驻港代表办事处只有 25 处，尚无接受存款公司。然而，到 1989 年底，香港的持牌银行增至 165 处，持牌接受存款公司 36 家。而且，香港银行业对海外同业资金调拨频繁，资金流入大于流出，从 1981 年至 1988 年，海外银行业存放香港同业的余额由 2579.30 亿港元增至 24283.78 亿港元；另一方面，香港银行业存放于海外同业的余额则由 1576.30 亿港元增至 20779.60 亿港元，两项相抵，存放于香港之外香港对外负债额、对外资产额以及资产和负债项目的外币部分日益增长。1969 年底，香港金融体系对外负债占负债总额的 11.2%，对外资产占资产总额的 41.1%，到 1989 年底，这些比例分别提高到 57.2% 和 60.8%，外币部分在资产总额中的比例自 1980 年的 56.2% 香港金融业革新技术，创新融资方式，近 30 年来，香港采用了国际金融业主要创新技术的八成以上，其中包括电子、光纤、电讯设备等新技术，其应用范围扩大到电脑处理资料、票据交换与清算、证券交易、国际金融交易的信息传递等方面，零售业务则普遍使用电子。1989 年，香港已有电子出纳机 1600 台，平均每万人约有 3 台，仅次于日、美、新加坡、挪威等国。金融创新方面的进展也很大，融资方式有外币与利率掉期、票据发行融资、银行贷款、远期利率合约等。存款方面，有各种外币存款、离岸存款、可转让存款证及掉期存款；支付工具方面有旅行支票。1 本世纪 60 年代香港金融业开始走向国际化，一些国际大银行通过香港原有银行增设分支机构、收购控制当地银行、向香港派遣代表办事处，以及开设接受存款公司等途径，不断扩大业务。1978 年 3 月以来，香港取消实行了十几年的限制，向外资银行打开大门，金融政策香港银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总行设在香港、并在香港注册的银行，1987 年这类银行有 31 家，占银行总数的 18.8%，其中包括英资银行 2 家，中资银行 6 家，当地银行 23 家。一类是总行不在香港，只在香港设立分行的银行，在 1989 年有 134 家，占银行总数的 81% 英资银行在香港银行体系中居于垄断地位，主要有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其垄断地位安然不动。就香港当地的金融业务而言，英资银行占整个市场的比重最大。两大银行的分支机构在 1988 年分别为 383 家和 118 家，占同年香港银行业分支机构总数 1397 家的 27.41% 和 8.4% 中资银行在香港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更加积极进取，多项业务迅速发展。中资银行中已形成了一个中银集团，其分支机构 1988 年就有 303 家，占当年全港银行分支机构的 21.7%。其存款业务

占整个市场的 20%左右，仅次于汇丰银行而居于第二，*1989 年 6 月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期间，中资银行曾遇到政治性挤提，但凭借其集团的实力、良好的信誉，以及同业、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港府采取适当的措施，很快平息了挤提事件，没有对香港经济造成不良影响。中银集团对于保持香港金融市场的正常操作和稳定发展，正发挥着越来越重*其它外资银行包括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家银行，它们大多是实力雄厚的国际性大银行，在世界 500 家大银行中排在前十位。主要有美资银行、日英银行、加拿大银行和欧洲、亚洲、澳大利亚各国的银行，其中以美、日资银行为最强大。1989 年香港有美资银行 20 家，日资银行 30 家。美资银行比日资银行进入香港时间早，但日资银行占香港银行业资产负债总额的一半以上，可谓来势甚猛，后来居上，并已成为其它外资银行中最大的集团。日资银行港元资产所占市场比例也从 1986 年的 9% 增到 17%，仅比中资银行少两个百分*当地银行也就是华资银行，其居于香港银行业的第四位，1946 年至 1964 年为其黄金时代。华美银行规模小、分支数量多，在香港华人特别是中下阶层和中小企业中独具进力。

1965 行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是通过金融市场体系的运作表现出来的，香港金融市场有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保险及期货市场等，门类齐全。

资金市场从经营角度划分，可分为银行业借贷市场和证券市场两大类。银行业时借贷市场又分一般和特殊两种。银行业的一般借贷市场包括银行业同业之间的借贷和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借贷，前者是解决同业的流动资金需求问题，后者是解决客户的流动资金需求问题。60 年代中期以来，香港银行业一般借款市场发展很快，1964 年同 1989 年相比，香港银行业同业拆借分别是 5.75 亿港元和 5223.7 亿港元，增长 908 倍；海外同业拆借分别是 5.67 亿港元和 24283.78 亿港元，增长 4282 倍；客户存款分别是 65.68 亿港元和 10076.58 亿港元，增长 152 倍；本港同业*1980 年与 1989 年相比，未清偿的存款证金额分别为 27.72 亿港元和 338.97 亿港元，增长了 11.2 倍；持有的存款证金额分别是 77.53 亿港元和 277 亿港元，增长了 3.5 倍。安排当地及国际间银团贷款活动，并迅速将其发展为一项重*1980 年至 1986 年，香港为全世界签订银团贷款及欧洲票据融资的次数共达 665 次，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居世界第三。在亚大地区则排名于东京和新加坡之前。

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股票市场在香港金融市场体系中是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市场之一。香港股票市场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逐渐形成，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和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1968 年时，只有一家“香港证券交易所”*10 多年来，香港上市公司发行股本和市场总值有数倍的增长。

股票市场是最敏感的市场之一，股票价格随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时起时落。例如 1973 年 12 月 10 日，大集集资能力也大为增强，到 1989 年底，香港上市公司增加到 298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达 6077 亿港元，比 1976 年的 131.83 亿港元增加 22.6 倍。股市的投机性极强，在其为市场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潜伏着灾难和危机。有位日本学者就把香港股票市场叫做“亚洲最大的金融赌场”。1987 年 10 月空前的大股灾起因于美国华尔街股市暴跌，而陷于全球性股灾。在这次股灾中，约有 80 万小投资者损失惨重，*香港债券发行数目并不多，到 1988 年底，在香港市场上交易的证券有 479 种，其中

普通股 309 种，优先普通股和优先股种，认股权证 116 种，信托基金 39 种，债券只有 9 种。

香港发行债券是从 1975 年开始的，1971 年至 1980 年的 10 年间，共计有 38 笔债券发行和上市，累计金*80 年代初，由于国际利率高企，香港债券市场也陷入低沉，直到 1983 年才开始趋干活跃。商业票据市场是在 70 年代末期出现工商业通过发行商业票据集资的活力才形成的。其发展速度迅猛，80 年以来发行数量一年超过一年，许多工商企业不断以发行新票据代替到期票据，这就使得这种短期香港的自由外汇市场是 1973 年 1 月 1 日开始解除外汇管制以后才逐步形成的。香港外汇市场自由发展，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不但形成了港币自由兑换外币的市场，而且形成了以美元为主的各种外币互相自由兑换的市场。在香港外汇市场中，美元是所有货币的交易媒介，*黄金市场在 70 年代以前一直以当地古老的传统方式进行交易，并不活跃。随着西方世界货币体系的崩溃和黄金地位的变化，港府为了促使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从 1974 年 1 月 1 日起解除了对黄金进出口的管制，使黄金进出口及交易自由化，黄金市场开始活跃，并*1910 年成立的香港金银贸易场、1974 年形成的伦敦金市场、1980 年设立的黄金商品期货市场共同构成了香港的黄金市场。香港金市每天交投量平均约达 80 余万两，即约为 1001480 港黄金进口总值为 184.49 亿港元，比 1986 年增加 273.5%。转口黄金总值 23.37 亿港元，比 1986 年减少 60%。金条进口总数量为 152.82 公斤，*除上述四大金融市场外，香港还有期货市场、保险市场、租赁市场和基金市场。香港期货市场是在 1977 年 12 月商品期货交易所成立后开始形成的，先后设立棉花、食糖、大豆、黄金口种期货市场，1981 年 10 月取消棉花期货，1986 年 5 月增设恒生指数期货交易。各种期货香港保险市场在历史上有良好的基础，其发展速度也很快。1988 年底香港保险公司共 276 司业务面向全球，险种完备。1987 年，香港购买人寿保险的人数约占全港总人口的 9%，总保险费收入估计超过 100 亿港元，其中人寿保险 30 多亿港元，一般保险 60 多亿港元。香港租赁市场开始发展于 70 年代，并成立了香港设备租赁协会，租赁物资范围很广，经营租赁业的大多是跨国租赁公司和大银行、大贸易集团。香 1981 年到 1985 年，每年在香港市场上买卖的基金品种分别为 69 种、83 种、107 种、125 种和 161 种。仅 1985 年的退休金一项就达到 300 亿港元，基金市场已成为资本市场中的一支劲旅。3. 国际金融中心的“避难所”由于香港政府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奉行的是“积极不干预政策”，所以香港金融市场的运行主要受法律的约束，港府只是间接管理，尤其是当金融市场出现危机时，港府的职责更加突出，充当了金融业的“避难所”。

港府对金融业运作的监管主要是通过银行、证券、期货和保险等四个方面的专门法例和监管机构实现的。港府于 1986 年 9 月 1 日经立法程序通过并实施新的《银行业条例》。香港的第一个《银行业条例》制定于 1948 年 1 月，1961 年时，一家华资银行发生挤提事件后，银行 1989 年再修订银行业条例时，改为持牌银行、有限牌照银行和注册接受存款公司。银行业条例规定设立银行监理专员和监理处，具体执行法例规定和各项监察工作。银监专员对金融机构的管理阶层有相当大的监察权力，如机构董事或公司秘书的委任要获得他的批准；在出现问题时，银监在证券和期货方面，港府主要制定了《证券条例风商品交易条例》和《保障投资人士条例》等。根据这些

条例，所有证券商或期货商、投资顾问及代表等均须注册，并符合一定的资格和经济要求；设立赔偿基金，使受不法经纪欺骗的客户可以获得赔偿。1987年大股灾*尽管如此，还要正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今后的发展中所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内地因素的重大影响，一是其竞争对手东京和新加坡对它的挑战。

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九七”香港回归和中国内地因素会不会影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应以长远的眼光作实事求是的考察，首先，中国政府把“一国两制”作为基本国策，并依宪法和这一基本国策，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虽然香港无法与伦敦、纽约这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相提并论，但是在亚洲，新加坡和东京则是香港的金融业对手。80年代亚大地区有5个金融中心，它们是：东京、马尼拉、台北、香港和新加坡。由于马尼拉政治不稳定、基础设施落后，不能和香港相抗衡。台湾虽然外汇香港、新加坡、东京在金融业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从经济和金融部门的规模来看，东京最大，香港次之，新加坡最小。以金融机构的数量而论，香港最多。从金融管制来看，香港管制最少，税务待遇较优；新加坡管制较香港多，税务不及香港待遇，东京管制和税*香港与新加坡、东京既竞争，又合作，相互依存。近年来，在东京金融中心日益发展的同时，日本金融界都很重视香港，许多日本银行纷纷涌入香港开业，到1989年中，香港外资银行已达30家，超过美国，占香港外资银行的第一位。日资也随之大量流入香港市场。

新*“九七”香港回归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肯定不会动摇，而且必将加强。因此，可以预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灿烂辉煌。

第六章 国共两党与台湾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

“分久必合”，这是历史的规律。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一日号，一直沿用了20年。然而，台湾并没有解放。

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思想，解决台湾问题，符合历史的潮流。

国共两党，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对手，曾经有过两次合作，而且这两次合作都取得了成功。

为什么国共同党不能成功地进行第三次合作呢？

“一国两制”在台湾引起的反响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已经具备，和平统一祖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明确表示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提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将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就在全同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当天，台湾国民党当局就拒绝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建议。据合众国际社台北1月1日电，针对《告台湾同胞书》，一剑国民党政府发言人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以过去的经验，已使我们有足够教训，论如何不能信任共产党人。发言人说，只有中国大陆的人民摆共产主义时，我们才会坐下来同任何人谈判然而，公开声明是一回事，实际上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和谈统一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上层人士的思想还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行动上也有所松动。就总的发展趋向来说，对祖国的和平统一是有利的。有些上层人士在公开场合发表谈话，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关于统*1981 针，这是《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政策的具体化。台湾上层人士一般都表示希望祖国统一。

国民党中常委王惕吾主办的台湾《联合报》发表文章说，台湾应该在心理上作准备，准备中国问题必须在 80 年代解决。有的指出应先建立经济共同体，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才能达到政治上的统一。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运璿在中国大陆问题研究讨论会上说，*由于台湾当局放宽政策，双方在各种场合接触多了，逐渐了解了一些双方的情况。一些台湾学者、民众曲道回日探亲、观光、定居的增多了。台湾研究三民主义的鼻祖、“总统府”国策顾问马壁先生回国定居。

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将相继圆满解决，为解决台湾问题起到了示范作用。

台湾的一些上层人士和“民意代表”表示“应沿着中英解决香港问题的路线走，把‘香港模式’作为解决台湾前途的参考”。台湾《联合报》违抗台湾当局的禁令，登载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其附件。1985 年 1 月 1 日和 2 日，台湾《中央日报》连续报道了在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的一部分社会舆论中，用“一国两制”方式统一中国，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在处理海峡两岸关系的策略上和具体做法上，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在舆论宣传上有所放宽；有关人士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台湾知识界对祖国大业非常关注，积极探讨和平统一的途径，发表关于统一的言论，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与大陆知识分子接触，共议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问题。

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体育、学术方面的交流，在实际上比过去有所发展。台湾高度评价大陆作家的作品，热情赞美祖国的锦绣河山，作家、艺术家、体育工作者交往不断增多。

台湾工商界人士也渴望早日实现“三通”。台湾工商界人看到台湾能源危机，资源缺乏，工商业发展前景凄凉，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看到大陆地大物博，市场广阔，纷纷希望到大陆做买卖，迫切要求通商。

实际上，海峡两岸的通邮、通商、通航事宜，早已间接地进行。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不仅进行间接通信的越来越多，而且间接贸易也在迅速增加。大陆许多地方可以见到台湾产品，台湾也有不少大陆产品。台湾各阶层渐渐不满足于间接“三通”，要求*但是，国民党台湾当局在和平谈判实现祖国统一问题上在初期没有大的动作。

我党对台政策的历史发展 1949 归纳为由武力对峙到以和平方式解决，由“一国一制”到“一国两制”。大致说来，以 1979 期。

1949 年，国共和平谈判宣告破裂。次日，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全军发布命令：彻底歼灭国民党军队，迅速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的独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迅速解放了南京及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及东南沿海广大地区。至 1950 年 5 月，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全部解放。随着大陆的解放和国民党败走台湾，中国积极准备渡海作战，提出了“绝不能允许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就在这时候，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在发动侵

朝战争的同时，公开声称“台湾地位未定”，派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用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中国预定的渡海作战计划受到阻碍。

随后，中国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台湾的问题搁置了下来。

1954 年，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 1954 年“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国人民为解放台湾，使台湾人民重回祖国怀抱，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从 1954 年到 1978 年的 24 年间，台湾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的武力对峙状态。不过，中国试图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已非一旦。当时，尽管提出的是“解放台湾”的口号，但是，1955 年 5 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5 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 1956 年 4 月，毛泽东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

1956 年，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 1956 年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但是，在当时国共两党严重敌对的形势下，中国的和平倡议没有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相反，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并向金门、马祖增调部队。此时，美国也加紧活动，压国民党接受其“划峡而治”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 1958 年 8 月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万炮齐在此同时，中国继续就和平解放台湾问题进行了努力。

1958 年，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再次建议“举行和平谈判，实行和平解决”。1959 年 9 月，在建国 10 周年前夕，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宣布对“确有弃恶从善”的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1965 年 7 月，毛泽东在会见归国的李宗仁时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从 1966 年 5 月到 1978 年 12 月，由于受到“左”的路线干扰，中国对台方针政策没有发展，并且明显转向强硬，基本上停留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空洞口号上。海峡两岸军事对峙更紧张。

但是，在此期间中国在外交上相当活跃，取得了很大成功。1971 年 10 月，联合国驱逐了台湾当局的席位，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 年 2 月，中美发表《上海公报》，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 年 9 月，中日两国建交。1978 年 12 月，中美正式建交。台湾当局在外交上出现了大溃退。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地区只有 20 多个，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近 120 个。

从 1955 年到 1978 年，中国已开始向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向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要达到的是“一国一制”，而不是“一国两制”。中国在这一阶段中提出的和平解决的方针，主要还是作为武力解决的辅助形式。

1978 年，方针政策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基础。

这时，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扫除了海峡两岸统一的国际因素的最障碍。

1979 年，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开始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新时期。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国民党据守的岛屿的炮击。1979 年，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这可以说是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发端。

1981 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如果说《告台湾同胞书》还只是一般性号召的话，那么这九条方针则是中国对台政策的具体化和基本点。

叶剑英“九条”阐明，“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

1982 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近年来，台湾的“台独”势力日益猖獗，台湾当局的态度暧昧，曾使两岸关系一度冷却。江泽民提出的八项主张，又给人们燃起了希望之火。

从中国对台政策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一国两制”是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其内容也是逐步完善起来的。

从目前中国的对台政策来看，可以说有了个基本点。一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或叫特别行政区。坚决反对于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二是采取适当的方式，即国共两党对等谈判，以达成和平统一*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既定方针。不管用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方式，都是中国的内政，外部无权干涉。世界上有些国家一再要求中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武力，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绝不会向任何国家作出这种承诺。这与以前的武力解*

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及其趋向 1979 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

面对中国和平统一祖国的立场，国民党的大陆政策，不得不一步步作了调整。

国民党的大陆政策，经过回避拒谈转而主动反制的发展过程，从零碎、消极、僵化的“旧大陆政策”，逐步演绎成为一套所谓完整积极、灵活的“新大陆政策”。

从 1979 年到 1981 年 3 月国民党十二大，台湾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因应策略，顽固拒和。

蒋经国等国民党领导人，利用会议演讲、庆典致词等，发表了大量反共拒和的言论，攻击中国的和谈主张是“阴谋”“陷阱”“骗局”，叫嚷坚决拒绝中国和谈统一主张是“当局”的“基本立场”“永不改变的国策”。

同时，台湾当局蓄意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1979 年底，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及总部机关在岛内举行了 30 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随后，国民党装甲兵、空军、海军及驻金门、马祖部队，又举行了多次以大陆为假想敌人的战斗演习。

台湾国民党当局成立反统战机构，强化对岛内的言论控制及对大陆的“心战”策反。国民党当局发布种种禁令，严厉禁止、处罚赞同或主张和谈统一者。

1980 口。

同年 8 月，台湾国贸局通令台湾所有输出厂商及贸易商，不得与大陆进行贸易，违者将送有关机关议处。

随后，台湾新闻局、交通部、经济部，陆续颁布禁令，禁止台湾影片在香港左派影院放映，禁止台湾旅行业与海外亲共旅行业来往，禁止台湾工商界直接、间接将产品销往大陆或进口大陆产品，禁止旅客或船员携带大陆

药品人台。对违反禁令或主张和谈统一者，罗织*在这一时期，台湾当局迫于形势，也采取了一些松动措施。但是，总的来看，松动的幅度范围都很小。

1981“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蒋经国声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使中国成为自由、和平、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唯一的可行道路”，提出“三不变”，也就是“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这一决策，表明国民党当局试图摆脱过去那种比较被动的消极反制做法。

1982 和平统一的意向，一些主张改变拒和策略，相应提出谈判条件的言论开始出现。

1982 小，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就自然会渐趋成熟。”与此同时，国民党官办杂志《自由中国之声》提出了中国统一“三阶段”的主张。1983 年 3 月，海外学人丘宏达在美国旧金山“中国统一之展望”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和平统一的“四条件”。1983 年 9 月，国民党的《香港时报》，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六原则”。

1985 方案”。

这样，统一问题由“政治禁区”逐渐变为可以公开讨论的论题，由民间议论发展成为国民党高层人士酝酿，讨论的内容也由是否要统一变为如何统一。

台湾当局的拒和调子逐年降低，借弹性主张试探各界反应，试图把“球”踢回大陆。

这一时期，台湾当局对海峡两岸关系进行了比较大的弹性松动。

1981 性”。国民党中央陆工委会主任白万祥说，对大陆的称谓作了新的规定，公开场合不再使用“匪伪”“匪军”之类的污辱性称呼。总政战部主任王升也表示，对大陆的“心战”要扬弃以往的讽 1982 减少，客观平实的报道逐渐增多，对大陆资讯也开始有选择地开放。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开始探讨有关统一的问题。

1984 1985 报道大陆问题的刊物。

这一时期，台湾高层人士对大陆取得的成就，逐渐持肯定态度。

台湾当局对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人员接触及贸易往来的限制也逐渐放松。

台湾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仅 1983 年 1 月到 10 月，双方在第三地探讨统一问题的接触就有 10 多次。’ 1984 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活动中”可以与大陆人员接触。这是国民党官方对两岸民间接触的第一次表态。在通邮方面，国民党当局也由禁止转为辅导。仅 1983 年一年，就有 1700 多件贴有中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访友，旅游经商，这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对此，国民党当局的态度，也由严厉禁止盘查，转为不过分预。

1981 船只，可以直接到达对方港口。

到 1985 年底，国民党当局取消了把大陆作为“完全禁航区”的决定，宣布凡受雇于外轮的台湾船只，经事先申请，即可不受限制地航至任何国家和地区。

对转口贸易，国民党当局则由默许转为公开宣布“不干涉”。1984 年 3 月，台湾“经济部”宣布放宽自港澳转口进入台湾的 1157 种产品限制，其中除当归、枸杞、黄花菜等 9 种物品列为公卖外，其余均允许民营，实际上默许民间通过港口形式与大陆通商。1985 年 7 月，台随着两岸的松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渐渐缓和。

1982 陆海上作业渔船不再抓扣，对借故靠近对方岛屿的渔船，也只盘查后遣返，不再作“匪谍”船只处理。

1984 年，但是持续时间不长。

1986 年《与世界和平》，代表国民党提出了对中国统一在政治、经济、社会、文教、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五项主张。这是蒋经国多年来对统一问题所作的第一次全面的阐述。

从此，国民党开始推展“政治革新”，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整个政治氛围转向开放，对大陆政策趋于主动，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统一主张，反对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这样，新大陆政策逐渐形成。

1987 年 3 月，行政院长俞国华在“立法院”答询时，两次公开表示“三不政策是消极的”“只是临时措施”，首次承认以台湾的武力进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他表示“所谓三不政策只是 1988 年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并进行了较全面调整。该案提出要“扩展台湾经济、支持大陆民主运动”“发挥政治影响，争取大陆民心”“运用台湾地区民主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力量，影响大陆经李登辉当选为国民党主席的十二大，是国民党大陆政策的转折，也是李登辉新大陆政策的起点。大会修改的国民党章程，把“消灭匪伪政权”改为“厉行民主新政”，删除“反共复国”等字句，把大陆政策重新定位为“扩大台湾经验，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发挥政治影响”这一时期，台湾当局开始有意识有步骤地较大地开放民交流。先是提出“官民分开”“政治与文化、学术、体育分离”的则，后来又提出“民间、间接、单向、渐进、安全”的开放原则，较幅度地开放大陆资讯、两岸文化来往。

国民党当局开放台湾记者赴大陆采访，允许台湾学者以民间团体名义赴大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开放大陆人员赴台湾奔丧，等等。

1988 年这表明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从单向发展到了双向。

1988 年“政总局”对大陆来信采取不盖邮戳和消除邮票的处理方法送交收信人。对经过第三地的两岸道航也放宽了规定，对转口贸易已由不干涉转为加强辅导，包括提供大陆经贸资讯，设立进口这表明，台湾当局对“三通”的限制更为放松。

这一时期，海峡局势更趋缓和。台湾当局开始裁减军队，国防预算有所减少。过去视为“反共前哨”的金门、马祖地区，也减少驻军，加紧经济建设和旅游开发。

1989 年“大陆邮件手续”两项议案。从 6 月 6 日起，可以直接向大陆通电话。寄给大陆信件也可以写明收 1990 年 1990 年在研拟设立处理两岸交流事务的中介机构，并在香港和大陆设立分支机构，并表示，台湾也可考虑*1993 年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江道涵举行会谈，双方就海协与海基会两地会务、两岸经济交流、科技文化交流等三项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双方均满意的成果。这次海基会最高负责人与海协最高海峡两岸关系的松动，除了当时国际环境和海峡两岸形势的变化等原因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台湾民众要求“三通”的愿望更加强烈，促使国民党当局在开放大陆探亲上采取更开明的态度和做法。

1995 年张。“江八点”切中了两岸关系的关键，在台湾及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形成了要求台湾当局口应的强大声势和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在高度重视的情况下，确立所谓“分层次、分阶*1995 除夕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

的八项主张作了初步回应，连战以“面对现状，增加交流，相互尊重，追求统一”为纲目，在坚持台湾大陆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用“有所变，有所不变”的谨言提出几点主张：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中国统一；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加强两岸交流，增进两岸经贸往来，发展利益互补关系；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双方领导人籍此自然会面；两*在讲话中，李登辉重申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当局坚持统一目标，提出两岸要发扬中华文化，增进民族感情，承诺增进两岸经济往来发展互补关系，“台湾的经济发展要把大陆列为腹地”，肯定了汪事会谈和两岸事务性商谈，称它们“标志着两岸关系走向人协商的*但是，李登辉在讲话中仍然主张“台湾与大陆分别由两个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治理”，要大陆客观对待所谓海峡两岸“分裂分治”的现实，台湾当局继续拥有对台澎金马的“主权与治权”，要求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要大陆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说只有在此之后，*从1990年3月李登辉当选“总统”以来，他在大力推动宪政改革的同时，也对大陆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这就是改变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一个国家、一个“法”和只能有一个中央政府的基本立场，而确立了所谓“一个国家，两个对等政府”的原则构想，着重突出台湾独立国民党当局大陆政策的重心转向“一国两府”，偏安求存，以台湾的存在和发展作为考虑，有着深刻的国际、两岸及岛内的社会政治原因。

1993一，反对分裂国土”的政策，实际上统的东西越来越少，独的东西越来越多。十四大及其以后的大陆政策，虽然没有最终突破“一个中国”的总框架，但其“独立”与“分裂”的色彩，1998从目前的情况看来，1998年李登辉寻求台湾事实“独立”的“理念”是不会改变的，他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与“务实”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其挟洋自重，倚仗外国势力分裂中国的策略也是不会改变的。国民党当局还会耍“假统真独”的把戏，不可能真心*以学者出身为主体的开明派势力，目前已在国民党决策层中占据上风，他们能够正视台湾当前面临的政治、外交、社会和经济困境，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放弃不切合实际的追求，以务实的态度，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去追求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实际利益，而把“名称”*祖国大陆反对分裂，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定立场，是台湾当局公开宣布及寻求“台湾独立”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1998年，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台湾当局是还不会对其大陆政策作根本性的调整，公然放弃“中华民国”这块招牌的。两岸之间现有的格局*从与台湾有关联的美、日等国来看，它们虽不愿看到中国统一，但也不愿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乃至走向最后摊牌的境地。这样，它们也被迫在台湾和大陆之间作出抉择，必然要对台湾当局施加适当的压力，使其不致于走得太远。美国、日本是要把台湾作为与中国发展*1998目前两岸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两岸关系在一定时间、某些方面，还有可能继续得到发展。

国共两党能否坐下谈在历史上，国共两党已经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胜利进行了北伐战争，第二次合作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两次国共合作，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独立、社会的发展。“两次国共合作之所以能够成功，有三个因素在起着作用：一是反映历史进程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二是人民要求国共合作，有使国家独立、富强、统一的强烈愿望；三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而实行的关于国共合作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

现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科学构想，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总结了前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从而提出了反映历史进程、民族利益和人民要求的正确主张。

这与前两次国共合作的前景虽然不同，但从其出发点看，仍然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这同前两次国共合作的基础是相同的。现在，国共两党在国家统一、民族利益、人民愿望等方面，仍然有着与前两次相似的共同点。

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唯一出路。

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才能尽早结束台湾与祖国大陆处于分裂状态的不幸局面，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使命。

当前，中国和世界的形势都是朝着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谁也阻挡不了。任何政党和个人，都应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为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

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利于振兴中华，促进现代化建设的伟业，对双方都有利。

为了建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需要在国内保持安定团结，在国际上实现和平与稳定。中国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进行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就可以集中更多的力量搞建设。

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美丽富饶，气候温和，雨量充分，物产丰富，但是，台湾工业基本上是以轻纺、装配业为主的工业生产体系，基础薄弱，依赖性大，具有某种畸形和片面发展的特点。台湾市场问题更为严重。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这种以靠加工出口的海岛经济，地狭人稠、资源有限，缺乏深厚的发展经济的基础，依赖西方，按现在的路子发展前途是困难的，如果国共两党合作，祖国统一，大陆丰富的资源，广大的市场，众多的人口劳力，都是台湾工商业的用武之地。台湾和祖国大陆在经济上本是一个整体。互相之间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这是相互的需要，对任何一方都有利而无害。

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统一祖国，有利于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

台湾是中国东南的屏障和门户，也是中国同太平洋各国海上往来的交通枢纽，还有国际机场通往各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过去，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侵略中国称霸亚洲和世界，往往都要占领台湾，构成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威胁。

目前，日本国内仍有一部分反动分子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美国也有一股势力，把台湾当作他们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台独”就是美、日等国的反动势力妄图霸占中国台湾、分裂中国的产物，原在日本活动，后在美国活动，现在进入台湾岛内。美国一些有*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有人说，现在国内没有北洋军阀那样的共同敌人，外部没有日本帝国主义那样的侵略威胁。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国民党则坚持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国在台湾”，国共两党很难再次合作。

事实上，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两度合作，是因为这两个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有求同的基础，而这两度合作之所以以破裂告终，除了若干历史因素以外，最主要的是国共两党在与共同敌人的矛盾解决之后，没有找到彼此求同存异的良策。

现在，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找到了两党求同存异的方法，为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和中国的统一提供了先决条件。

除了这个先决条件外，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有着基础，这就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点。

双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曾反复说，有人妄图制造两个中国，这是中国人民最大最深的隐忧，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蒋经国主政台湾后，仍然坚持“中国只有一个”，1980年6月15日，他曾对英国《观察家报》记者说，“如果中国大陆遭到入侵，台湾既不会加以利用，也不会袖手旁观”“凡是入侵大陆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现任国民党领导人李登辉，也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只不过“一个中国”的内涵不同。

双方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大陆和台湾，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还是血缘上、语言文化上，都是一个整体。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都认为中国应该走向统一。国民党台湾当局认为，“统一中国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中国共产党更是始终坚持统一祖国。

双方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自50年代中期以来，国民党就强调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后来又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以自由民主统一中国，这与起初的“反攻大陆”有所不同，实际上就是不主张以武力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现在，李登辉也主张*在希望“改善民生”问题上，国共两党及政治纲领虽然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也有相似之处。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毛泽东也早就说过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相同。近年来台湾这方面的论述增多。他们说：孙中山先生*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景，也是决定国共两党合作何日到来的因素之一。国共两党曾两度合作，但两度分裂，第三次合作会不会故伎重演呢？多年来的隔绝，造成千百万同胞骨肉离散，这是凝聚力极强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所不能容忍的。尤其是经济近代史上的百年屈辱，中华民族要发愤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分裂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最大障碍。人心思合，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分裂，是因为当时中国还不是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其内政很难摆脱外来干涉的影响，而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大国，国共第三次合作后，外来干涉将很难得逞。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它经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第三次国共合作，将形成一个由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振兴中华的强大联盟。在这个联盟里，只要忠于中华民族和祖国，就有广*我党不提政府间谈判，而提两党谈判，就是照顾到双方的对等关系，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平等地位。

大陆争取和平统一中国，提出了“两个寄希望”，即“寄希望于台湾当

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两者是统一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明白无误，而寄希望于台湾当局，许多人不理解。

寄希望台湾当局，也就是寄希望于国民党。

对国民党这些年的情况客观他说，它是一个经济建设上尚有热情，而政治上却自以为是，与人民离心离德的政党。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对它寄予希望？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和平统一中国的目标，还找不到一个能代表台湾人民利益的代表人物或社会团体来进行谈判。即使能找到，谈判达成的协议，对当局也没有约束力，也无法变为现实。

国民党当局虽不代表台湾民众利益，但它到台 40 多年，而且一直控制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权，左右着台湾局势，是实际上的统治者。

因此，在国际潮流趋于通过谈判、对话解决问题的时候，与国民党“坐下谈”的方法，探讨“统一中国”这一棘手问题，可以说人皆赞同。

我们庸需回顾本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末期国共两党恩恩怨怨的历史，历史自会作出公正评判。

仅就 50 年代至今来看，前 30 年是剑拔弩张。人民解放军在解放福建沿海岛屿，1949 年 10 月进攻金门岛，1950 年 5 月解放舟山群岛，1955 年 1 月解放一江山岛，1955 年 2 月解放大陈岛的时候，与国民党军队刀枪相见，用纷飞的战火对话，台湾海峡硝烟弥漫。

此后 3 年，双方虽然没有激烈战斗，但随着“保护”台湾的美军的屠牛式导弹部队的开进，台湾海峡局势仍十分紧张。1958 年 8 月，驻扎金门、马祖的“国军”，与大陆福建沿海发生激烈炮战，一发而不可收，台湾海峡战云又密布。直到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表*真正的停火，是从 1979 年元旦开始的。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不仅建议尽快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和分裂局面，而且希望实行“三通”（通邮、通航、通商），互相往来，共谋统一。

此时，蒋介石已躺在了水晶棺里，蒋经国继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和“总统”职位。

接着，1981 年 9 月 30 日，叶剑英委员长在国庆前夕发表讲话，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1982 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1983 年 6 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字时，又提出台湾“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需到北京”“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但是，对北京抛来的束束鲜花，蒋经国置之不理，仍坚持他的“三不”（不谈判、不妥协、不接触）的政策。

当蒋氏在浙江奉化老家的蒋氏陵园维修好后，法国著名记者塞尔日·伦茨访问台湾，回国后发表了对此事的一段颇为幽默的述评。伦茨说到：“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家子真叫绝了！台湾提出的是武打架式，北京则搞陵墓外交。让我解释一下：共产党人用中国的 63 种方言骂国民党骂了几十年后忽然变得客气了，变得和解了。他们派了秘使去告诉蒋经国，蒋氏在溪口的陵园维修得很好，他先父在（台北）慈湖*当然，也不能把蒋经国看得与“乃父”一样固执到底。他毕竟留学过苏联，多上些见识就多一些开明。

1981 他指出“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中国必将统一”“这个日子不久将会到来”。这当然是在坚持“三不”政策的前提下讲这番话的。

尽管如此，态度已确有转变，最明显的是改变了长期坚持的“反攻大陆”的提法。香港一家报纸认为，这“实在是一个极重要的极伟大的划时代的决定”。

1980 加数十个品种。从 1985 年到 1987 年，两岸转口贸易额每年都超过 10 亿美元。

这些现象，是在台湾当局“不与大陆直接接触，不与大陆代表直接谈判，对转口贸易不干预”三大原则确定前后出现的。

1987 湾学术机构在不得个人保留的前提下，订阅大陆的一切书刊。台湾新闻局又设立政治、历史、社会、科技和艺术 5 个委员会，对进口大陆书刊进行审查后，让 50 多家出版社翻印出版。更微妙的是，稍前一些时候的 1986 年初，美国《时代》杂志第一期以邓小平大幅照片为封面，以 2 幻的篇幅介绍大陆经济改革情况。运到台湾后，台湾当局居然未加干涉，如数送到各个订户手中。读者反映说，“这真叫人吃惊不小”。

1986 后，大陆连续用电报邀请台湾方面派代表前来商谈解决办法。

开始，台湾当局坚决不与大陆直接谈判，后来在岛内外的压力下，才同意由“华航”出面与中国民航在香港谈判，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为迷惑民众，台湾当局犹抱琵琶半遮面，还说这次谈判是纯业务性的民间接触。事实上，中国民航和中华航空公司都是官方机构，尽人皆知。国民党当局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海峡两岸隔离了 37 年的首次官方接触，曾使世界舆论哗然。日本《东京新闻》发表评论说，“是大陆和台湾关系一举向前发展的划时代事件”。美国《已尔底摩太阳报》发表社论说，“两航谈判可能成为大陆台湾寻求和解过程中的里程碑”。

1987 赴大陆采访的决定。此前，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潞率先在大陆进行了采访。

《自立晚报》两位记者采访祖国大陆，对发展两岸关系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和积极作用。

1987 选的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微笑着对他说：“你们是第一只燕子，第二只燕子，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燕子陆续飞来。”1987 和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以内的人，可登记赴大陆探亲。台湾“内政部”公布了台湾赴大陆探亲的实施细则，规定每年探亲一次，每次可停留三个月，并向台*台湾报刊近年来对大陆科技、经济、文教、体育以及两岸关系等方面，也多有报道。

这一切，无疑都是蒋经国的明智之举。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继任国民党主席和台湾“总统”。

但是，国共两党谈判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共产党仍不断抛出花束，而李登辉似接非接，好像一位心事重重的演员。

有时，李登辉对两党谈判显示出很大热情。1990 年 3 月，李登辉在参加基督教聚会时，曾对大陆政策作了最明确的表示：“未来六年之内，我们一定会有机会，也必然有机会重返大陆。”言之凿凿，但这话又从何说起？军事反攻，打回大陆？等待大陆内部发生变化，“政治登陆”？放弃“三不”政策，与大陆坐下谈判？看来，前两个问题不大可能，李登辉的意思该是第

三个吧！但李登辉对国共谈判的态度却值得研究。李登辉是台北人，在登上“总统”宝座之后，已使台湾当局上层政权逐步实现了“本土化”，近年来，他虽然口头上也说“要以统一中国为那责”，但这不过是应付大陆和平衡台岛各界人士、民众心态，同时也平衡国际舆论*这些情况，都预示着李登辉可能在近年内顺应台湾各方面势力要求两党谈判的潮流，放弃僵化的“三不”政策，并同共产党进行高层次的接触。

901992 整，不断放宽有关两岸民间交流的性质。

两岸关系引人注目的发展，是海峡两岸两会商谈。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经过预备性协商之后，两岸两会最高领导人，实现了第一次“汪辜会谈”。1993 年 4 月下旬，汪道涵辜振甫在新加坡分别就两会会务、两岸经济交流、科技文化交流等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会谈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一位台湾研究专家说，过去 40 多年，在蒋介石时期，两岸基本上处于“隔海对骂”状态。在蒋经国时期，两岸基本上处于大陆“单方喊话”状态。李登辉上台以后，两岸基本上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这次会谈，虽然还是民间性*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会谈取得了双方均满意的结果，成为两岸民间交流制度化的里程碑。江泽民说：“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有效果的，它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李登辉也说：海峡两岸总是要谈的，不接触不行，这次汪辜会谈是一个*“汪辜会谈”虽是两岸民间中介机构负责人的会谈，但由于海基会是台湾国民党陆工会授权单位，具有浓厚官方色彩，台湾当局批准举行此次会谈本身，就标志着台湾官方多年来坚持的“三不”政策已经放弃。

“汪辜会谈”后，两会事务性商谈逐渐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但是，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调整，主要是在策略上和手法上的改变，其基本立场和政策仍无实质性变化。

在 1995 年 5 月两会秘书长为第二次“汪辜会谈”进一步进行预备性协商时，曾达到以下共识，将于 1995 年 7 月进行第二次“汪辜会谈”。但是，由于李登辉 6 月访美，发表分裂祖国的言论，因此“海协会”致函“海基会”，表示鉴于台湾方面采取的一系列破坏两岸关系的 1996 年，由于香港回归影响到两岸关系，两岸有可能进行磋商会谈。

1998：香港回归后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按照 1984 年 12 月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规定，自 1997 年 7 月：日起，中国政府正式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

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 1990 年 4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回归后，将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在香港地区实行高度自治，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

1997 土上统治的历史。同时，由于香港对两岸的重要性，香港回归将会对两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可能为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创造机遇。

1998 影响。

香港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具有特殊的地位。

由于本世纪 60 年代和 80 年代香港经济迅速发展，香港已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是世界最大的转运港之一。

70 在大陆方面，香港既是中国对外通商、通航的主要口岸，也是获取外部信息及建立外部联系的主要渠道。

在台湾方面，台湾经香港转口或就地销售的产品并不多，并且除少量不可替代的大陆中药材以外，禁止与大陆有其他任何经贸关系。

在此期间，香港对于双方的重要性不同，对两岸关系并不具有重要影响，只是在两岸间居某种特殊地位。

从 80 年代起，由于大陆经济发展及两岸经贸关系的带动，香港在两岸间的地位日益重要。

1979 贸易额大幅度增长，虽然台湾当局坚持“三不”政策，严禁与大陆通邮、通商、通航，但台湾民众已开始经香港进入大陆经商或访问。1988 年以后，台湾当局开始逐步松动两岸关系，允许台湾民众经常地赴大陆探亲旅游，也允许两岸间接贸易投资，放宽台商对大陆间接投资。与此同时，大陆采取扩大两岸经贸关系和鼓励台商投资的政策，积极谋求两岸的“三通”和正常往来，两岸关系进入较快发展的时期。

由于台湾当局在大陆政策上，始终坚持官方关系的“三不”政策和民间关系的“间接原则”的立场，香港以其优越的条件，成为两岸交往最便利的地点、台商对大陆投资的中转站和两岸贸易的最主要口岸。近年来，两岸经香港间接贸易规模已达每年 150 亿美元以上，人随着“九七”香港回归祖国，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不仅台港关系的性质将发生变化，而且必然会牵动两岸关系的变化。

不论是大陆方面的处理香港的“涉台问题”，或是台湾方面的处理“香港问题”，其本质上都是面对“九七”后台港关系，进而也就是两岸关系的重新调整问题。

对于大陆来说，在香港问题上，“九七”后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台港关系只是组成部分。但在两岸关系中，台港关系又是两岸关系的组成部分。由于香港在两岸关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香港回归必然牵动两岸关系的变化。“九七”后的台港关系已成为大陆*现阶段的两岸政策，在 1998 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在香港问题上存在不少问题。

在现阶段，大陆方面不会接受台港关系是台北与香港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台湾方面也不会接受两地是“地方对地方”的关系。

两岸关系的相互定位问题，是当前两岸间的基本分歧。所谓“主权之争”，应是在国际上由谁代表中国主权之争。如果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并主张和平统一，则双方在国际上的“主权之争”即代表权之争与两岸关系即国家统一进程之间，应可找到暂时容纳*大陆对台港关系政策与其对台政策、对香港政策，均有从属关系。简单来说，大陆对台港关系的政策，就是在“九七”后台港关系属两岸关系的“特殊关系”，在香港基本法的体制下，维持原有台港关系不变。从 1990 年国民党成立“陆工会”后，台湾对台港关系政策*1998 奢望台港关系的谈判能够解决两岸的主要分歧，但对解决这个问题能够促进两岸关系的前景，持有期待心理，因而对谈判抱谨慎对待的态度。同时，大陆提出的处理“九七”后香港涉*在台湾方面，虽然准备在“九七”后维持现有台港关系，但在另 J 方面，也在争取单方面处理有关问题的主动地位，避免在谈判时增加对方的筹码。

大陆规范台港关系的法律架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但涉台事务的授权与批准权均在中央，同时，基本法并没有规定如何处理特别行政区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关系。因此，在“九七”后大陆管理台港关系的法律体系，在基本法中的地位，并未明确规定。

从一定的角度来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 1998 年乃至以后的台港关系的法律问题,预留了相当的空间。

但是,无论两岸的立法意图和方式如何,任何未经谈判或单方面立法,均不能解决在双边关系中涉及对方管辖权的问题。首先,虽然大陆可能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台港关系的法律问题,但如果谈判跨越“九七”,则势必对台港关系造成不利影响。其次,台湾如在有*从 1993 年下半年以来,海峡两岸都通过各种公开渠道,多次表示有意谈判“九七”后的台港关系。

1995 港回归对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振兴的重要意义。同年 4 月,李登辉在回应的“六点”中提到,“九七”后继续维持与港澳的正常联系。虽然“李六点”又提到进一步参与港澳事务及“共*就两岸关系而言,1993 年下半年,双方谈判台港关系的条件已经具备,但由于台湾的大陆政策受对外政策的牵制,迟迟不能进行,进而在 1995 年 6 月因李登辉的“私人访美”和“务实外交”的积累效应冲击两岸关系,造成目前两岸关系的紧张状况,使双方对台港关系的从现阶段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以及双方政策可能出现的互动关系来说,虽然目前两岸关系,增加了“九七”香港回归对两岸关系发展影响的变数,但其程度还不足以改变双方对台港关系的基本立场。

以两岸关系与台港关系作一对比,目前两岸关系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双方谈什么内容,而是如何坐下来谈,而台港关系的问题,是双方已有议题可谈,只是还没有坐下谈。

“九七”香港回归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在台港关系方面,“九七”后台港关系成为两岸关系的组成部分,改变了两岸关系的现状。台港关系作为两岸关系的“特殊部分”,在客观上已形成了两岸“局部三通”的局面。

“局部三通”有助于改变目前单向和间接的两岸关系现状,推动“直接三通”的实现。在两岸方面,由于台港的带动,两岸直航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促成两岸直航的因素很多,包括大陆、台湾经济发展趋势,两岸经贸关系及科技、文化、教育、社会交往等。由于香港在亚大地区及两岸关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其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占有关键地位。多年来,两岸“三通”的障碍主要来自政治,台港直航在“九七”后维持不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变相的直航性质,使原来因政治因素而难以解决的问题,转变为实际上可以操作的比较现实的利益问题。

更重要的是,由于台港直航,作为两岸政治关系标志的“间接三通”,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原有政策上的象征意义。

可以预料,两岸的通商、通邮和各种交流交往,也同样会受到台港关系的影响,从而有可能使两岸关系的发展获得一个新的起点。

所谓台港“局部三通”,固然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一步,但其在现阶段两岸关系发展中,并非关键的一步。正像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统一一样,“局部三通”仅仅表明,台湾试图以“三通”换取“国际生存空间”的政策,暂时告一段落。

如果排除相对间接和不确定的变数,能够影响台港关系,进而影响两岸关系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九七”后香港的稳定,一个是两岸在台港关系上的谈判。

对于前者,虽然说现在定论为时尚早,但大陆出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的要求,唯有全力以赴别无其他选择。而后者事关谈判双方,大体上有

以下几种可能：在“九七”前，两岸就台港关系达成原则协议；在“九七”前开始谈判，但谈判跨越“九七”；在“九七”*第一种情况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基本上是正面的。但在未来也有可能出现台港关系与两岸关系之间某种竞争性的局面，即产生两岸的其它口岸间的“直通”取代台港“直通”，或口岸之间相互竞争的问题。

在第二种情况下，“九七”后台港关系受到谈判的影响，台湾可能加强其在“亚太营运中心”的运作，并以“境外转运中心”的方式，减轻其在谈判中受到两岸及台港关系上的压力。

至于第三种情况，确切地说就是两岸政策对立的局面跨越“九七”，则可能因为台港关系不能确定，两岸在亚大地区出现更广泛的竞争。台湾转向以发展“亚太营运中心”为政策的主要导向，并在亚大地区寻找新的替代转运口岸。同时，作为对应，大陆则可能完全排*尽管目前两岸政治关系处于低潮，势必对两岸在台港关系的谈判造成影响，但从现实情况考察，在1998年，香港回归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仍以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只是情况也许会更曲折和多变。

1998：香港回归后的台港关系几十年来，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由港的经济政策，先进的资讯和交通设施，以及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有利条件，使得台湾日益重视香港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断调整对港政策，加强台港关系。

在海峡两岸的互动关系上，香港一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1998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一个特殊的地方行政区。

届时，台港关系如何定位？台湾将如何处理与香港的关系？从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以来，香港始终是两岸之间一个颇为敏感的区域。几十年来，台湾当局的对港政策也随时势变迁而发生变化，但两地一直保持着“准官方”的关系。在蒋氏父子治台时期，他们一直申明对香港拥有主权，却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1984依照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精神，到香港回归后的1998年，台港间的“准官方”关系无疑“寿终正寝”。台湾当局向香港派驻的组织和机构也面临“存亡危机”，无法再“以政府面目，执行政府功能”而继续留存。

这样，台港关系将从“准官方”关系走向民间关系。

1995外交部长钱其琛，宣布了香港涉台问题的七项基本原则和政策，将“九七”后台港关系定位为“两岸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这就从根本上“封杀”了台港官方性、政治性关系存在的可第一，可能会在香港出现一个类似“海基会”的“台港交流基金会”，打着“民间”的旗号，行政府机构之职能，由它来统一协调台港关系，处理台港间的重大事务。

第二，活动由公开转为“地下”，由政治走向文化和经贸等领域，以从事工商业等合法形式，进行非法活动。

第三，在港机构逐渐“融入”香港社会，成为香港的法人，人员也从定居香港的或直接从香港或直接从香港居民中招募。

第四，借助国际反华势力，加强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势。

经贸关系是联系香港的最重要的纽带。

据台湾“财政部”统计，截止1994年底，台湾工商界在香港设立的公

司有 2000 多家，在港直接投资为 40 多亿美元。1994 年，台湾对香港的出口额高达 212 亿美元，1995 年更是超过 260 亿美元，并且香港已经取代了美国与日本成为台湾的最大贸易伙伴。

据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预测，“九七”后香港仍是投资者的乐园。

对于台湾来说，到 1998 年，台湾经济合作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一方面，香港作为举世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信息中小其优越的经济地位是其他地区包括新加坡在内所无法代替的。另一方面，香港在日益扩大和加深的两岸经济交流中充当着特殊的*在台湾当局解除了香港作为台胞旅游观光首站的限制后，台港两地的人员往来出现大幅增长，连年突破百万人次，香港作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和美食中心，加上台港特殊的历史文化渊源，每年都吸引着大批台湾游客和其他人员赴港。相应地，香港赴台观光和从事各*香港回归后，无论是台港之间的人员往来，还是经香港赴大陆或者经香港赴台人员，都看不出有任何减少的必要和理由，因为台港之间及大陆与台港三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血缘、文化和经济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决定了台湾当局无法通过制定政策来控制台胞*到 1998 年，台港问人员交往不但势头难以遏制，而且随着经济联系增加还会不断发展。

台港两地文化同属于中华文化范畴，并且又都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有着大体的文化背景和基本一致的文化源泉，并且，香港也充当着两岸文化交流的中介角色，常常成为大陆和港台三地文化合作的主办地。

香港回归以后，角色虽有所转换，但因其社会制度仍保持不变，所以对台港两地的文化交流影响不会太大。可以预见，1998 年，台港之间的文化交流势不可挡。

第七章 台湾与中国大陆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中华版图上的一个小岛；台湾海峡，从地理上隔开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一纸《马关条约》，就决定了台湾的命运。虽然，刘永相的黑旗军顽强抵抗，台湾军民可歌可泣，但终将被近代的日本“合法”占去 50 年。

抗战胜利后，台湾被国民党军队接替；国民党在大陆崩溃，只好苦心经营台湾孤岛。

4040 人们不禁要问，台湾，你将向何处去？

台湾 50 年殖民地当初，谁也没料到因为朝鲜问题，竟丢掉了台湾。这一丢，竟让日本人统治台湾长达 50 年。1894 年 7 月，日本联合舰队击毁了北洋舰队，1895 年 3 月侵占澎湖，清政府战败，主和派得势，于 4 月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还向日本赔款 2 亿两白银。

清政府实权派李鸿章声称，台湾是“恶疫流行，盗匪猖獗，所谓蛮烟瘴雾之地，送给伊藤博文也无谓”。

6 资纪办理了交接手续。

割台消息传开，全台哗然，群情沸腾。台湾绅士丘逢甲等联名致电清政府说：“臣桑梓之地，义共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在北京的台籍官吏、

举人联名上书。康有力、梁启超等 1300 多名举人举行集会，反对割台。

对外懦弱的清政府，也曾指望外国干涉，赎回台湾。遭到拒绝后，清政府命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等在台文武官员回大陆。

见到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以丘逢甲为首的绅士官僚于 5 月 25 日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总统，刘永福为民主大将军，邱逢甲为义勇统领，建国号“永清”，表示永远忠于清朝。唐景崧在就任的当天，致电清政府：“台湾士民，义不服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与“台湾民主国”成立的同时，日军开始进攻台湾。5 月 30 日，日军在基隆港东面登陆，6 月 4 日进攻基隆，逼近台北。当晚，唐景崧化装逃往淡水，6 日乘德国轮船逃到厦门，7 日日军先头部队开进台北，林朝栋、丘逢甲等人相继内渡。台湾民主国昙花一现，仅存在了 126 驻扎在台湾南部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集合各路兵马，宣誓抗敌。各地人民纷纷组织义军，配合黑旗军阻击敌人。最后弹尽粮绝，刘永福乘英轮逃往厦门。历时 5 个月的抗日反割台战争，成千上万的台湾军民壮烈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抗日篇章。

日本“平定”台湾之后，于 1895 年 11 月发布命令，在 1897 年 5 月 8 日前不离开台湾的中国人，将被编入日本国籍。1899 年，日本又颁布关税法，限制台湾人渡航中国，取缔中国人到台湾，推广日语教育等，设法从各方面割断台湾及居民与大陆的联系，变台湾为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

为了建立殖民地经济的基础，把台湾变成日本的原料供应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日本殖民当局进行土地丈量和林野调查，把没收的土地和林野廉价卖给日本资本家，在台湾培植日本地主阶层。1898 年，殖民当局设立台湾银行，建立了与日本本土统一的通*台湾人民不屈不挠，多次举行反。日武装斗争，但都失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台湾知识分子吸收了前期反日武装斗争的教训，在五四运动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从 1920 年开始，开展了以群众性政治文化斗争为主的反日解放运动。

1920 治文化启蒙运动的火把。1921 年，在台湾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会员很快发展到 1000 多名。

同时，台湾的地主阶级也在开始进行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

1937 战争。为了把台湾作为前进基地，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台湾的资源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加强了对台湾的军国主义统治。1936 年，日本总督小林跻造提出了“皇民化”“工业化”“南方发展”作为其治台的总方针，企图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传统，成为日本的顺民。

日本殖民当局将强迫台湾人民改用日本姓名列为“皇民化运动”的项目之一。以增加日用品和生活燃料配给量、子弟优先入学等条件，诱使台湾人民改用日本姓名。

许多台湾人民以“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更名”为信条，义正辞严地加以拒绝。

另有部分台湾人民采用种种巧妙办法，如用拆字、谐音之法，将吕姓改为“宫内”，雷姓改为“雨田”，张姓改为“弓长”，戴姓改为“田井”（戴与日语田井读音相近）。

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强制推行“国语教学”（日语教学）“似我教育”（同化主义教育）和“帝国臣民”教育（奴化教育）。在专为台湾学龄儿童

开设的“公学校”里，汉语教学基本上被撤销。

针对这种情况，台湾民间秘密设立了许多书房（私塾）来进行汉语教学。台湾著名诗人洪弃生、赵一山等都曾设馆授徒。

日本统治的 50 年，是罪恶昭彰的 50 年。对台湾人民，日本政治上加强所谓“皇民化”，经济上扶植顺民买办资本，加紧对台湾社会渗透。

台湾人民所受的是来自异民族的殖民压迫，抗争的过程中牢牢地把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保持下来。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腐败无能，民穷国弱，对台湾人民的抗争又未给予有力的直接援助，加上日本 50 年的文化教育和文化侵略，其在于斩断中华文化脐带，*台湾意识的畸变，不在于爱国爱乡的台湾民众，现在闹得最厉害的“台独”分子，恰恰是日据时代的顺民或者“恋日”人士。

台湾意识畸变为台独意识，正是日本皇民化的恶果，也暴露了卖国的汉奸分裂祖国的图谋。

世界总在变化。

当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台湾，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又给了中国得到台湾的机会。

蒋介石抓住了这次机会。1943 年 11 月，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举行会晤，商议战后有关问题。

开罗会议其中的一项内容涉及到日本战败后台湾的归属问题。蒋介石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据理力争，要收回台湾。

在当时罗斯福眼里，支撑中国抗战局面的，除了美国人就是蒋介石了。由于当时特别需要蒋的抗战拖住日本，所以二战后对蒋的一些正当要求就不好拒绝了。

就这样，中、美、英三大国就战后的台湾归属问题达成协议。

1943 在剥夺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州、台湾、澎湖群岛，归还中国。

蒋介石后来在 60 年代曾说：“我最恨的是日本人，因为当年他们把我们的东北和台湾都抢走了，还使我落了个卖国的名声。”蒋介石卖了国是真的，但在抓住时机收回台湾问题上，他也是作出了努力的。

就这样，开罗会议为中国收复台湾定了调。

1945

蒋氏父子在台湾 1945 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民党如此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国民党节节败退，南京失守，上海不保，继而整个势力在大陆纷纷瓦解，如秋风落叶，败逃台湾。

蒋介石是在 1949 年败退到台湾的。

由泱泱大陆到孤岛台湾，对蒋介石来说，绝对不是没有触动的，蒋介石的确对国民党的失败有些痛心疾首。

1950 是，它在这种外来势力的大力支撑下，获得了喘息时间。

经过反思，蒋介石决定在 1950 年发起对国民党的“改造”运动。

1950 案》。8 月，蒋介石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停止六届中执、监委职权，中央改造委员会由陈诚、张其勋、张道藩、谷正纲、蒋经国、沈昌焕、郑彦芬、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这次改造，蒋介石是动了真格的，思想、政治、组织人事、制度各方面都有涉及。

国民党的“改造”和重建，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组织整顿，一是思想清理。蒋介石批评国民党组织系统“只见党部，不见党员”，于是号召“党员归队”，从中央到“小组”各级组织进行层层“改造”。对于未“归队”的党员，一律撤销党籍。蒋介石总结以往*陈立夫本是蒋介石恩人陈其美的侄子和嗣子，国民党大派系头目之一。然而他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却送他5万美元，迫他赴美。行前，陈立夫向蒋夫人辞行。宋美龄送他一本《圣经》，说：“你在政治上负过那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难以适应，这里在对国民党的“改造”中，对国民党的特情系统也进行了整顿重建，蒋经国掌握了大权。蒋介石的意思是：“让我的儿子主管特情系统，你们准有异志，小心一点！”经过这次“改造”，蒋介石独揽了大权，台湾才真正健全了国民党统治秩序，稳定了台湾岛内动荡不安的局势。

国民党当局为了尽快摆脱困境，求得生存，在稳定财政、恢复经济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

1949 介石总是怕触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而不了了之。在台湾，作为客居的大陆籍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不再代表从前大陆上地主阶级的利益，也与台湾地主阶级的利益不相干，*蒋介石的“土改”三部曲，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限定耕地租金不得超过主要产物全年收获总量的 37.5%。第二步是“公地放领”，将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以有偿形式转让给农民所有。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

经过这土地改革，使大量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刺激了农业生产，对封建主义势力打击很大，成功地恢复和提高了台湾农业水平，为台湾今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蒋介石很清楚，要想在台湾生存下去，首先必须发展经济，于是，在财经第一号人物尹促容的主持下，连续制定了多个四年计划，在农业改革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了农业，又于 1964 在 70*蒋介石念念不忘“反共复国”。他虽然也提“巩固台湾”，而他的真正意图乃是放在“准备反攻大陆”上。但是，随着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其复辟梦想遂告破产。

1975 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即蒋经国时代的到来。

早在台湾经济调整时期，蒋介石就加快了对儿子蒋经国的交接班工作，先后历经 10 年之久。

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和“总统”以后，台湾政治体制发生了一些变化，逐渐改变了蒋介石时代的独裁体制。

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蒋经国采取了许多措施。在政治上进一步对台籍人士开放，缓和在省籍问题上引起的激烈冲突，扩大了政权基础。这是蒋经国政权维持下去的一个关键问题。国民党多年来对岛内人民的专制强权统治，也有所放松。为了缓和矛盾，国民党当局对*在施政上，蒋经国提出了“革新”的主张，并把廉政放在首位，能够以身作则。王正谊是蒋经国的至亲，曾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兼中央公务人员购置住宅辅助委员会主委，后因卷入士林外双溪中央社区工程舞弊案，贪污美元 13 万多，也被判处无期徒刑。

蒋经国还从国民党历史包袱的根本人手，借用岛内兴起的革新保台政治思潮，向党内保守的元老政治势力施加压力，推行所谓“本上化、专业化、年轻化”政治。

蒋经国在压制台湾人民的同时，对大陆政策也作了一些调整。面对现

实调整了反共方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逐渐减少，基本上放弃了“反攻大陆”的方针，而代之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

对于越来越强大的党外势力，蒋经国为了巩固从蒋介石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权，不得不采取了压制手段，设置重重障碍，不让其发展，对其代表人物进行迫害。

蒋经国虽然通过革新，消除了统治格局的一些弊端，但其实从他执政那一天起就已经有了一些危机。

70 民党政权内外政策的僵化，使社会大众产生了严重的信心危机。在权力继承上，对外关系上都发生了危机。

蒋经国晚年，也承认国民党面临的非常局面。为了以变革求生存，为了对历史有个交代，在 1986 年 3 月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了“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的政治口号。

这次“革新”，主要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制化”“革新党务”“调整大陆政策”等。以解严和开禁为标志，台湾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转型期，各种社会力量重新组合，政治日趋多元化，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有所松动。

这次革新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是解除了大陆籍垄断权力的禁锢，加强了政权与台湾社会的关系，确保了蒋经国死后的社会稳定和权力的顺利交接。1987 年国民党政权“五院”院长中的两院院长，“行政院”下属 8 部的 5 个部长，都由台籍人士担任。

1988 蒋经国逝世后，“副总统”李登辉接任“总统”，随后担任国民党主席。台湾从此进入了李登辉时代。

台湾与大陆统一的模式问题自从中英、中葡分别签署关于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之后，台湾问题便更突出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一直坚持用“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平统一祖国。

“一国两制”构想的出台，用“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成功，在台湾岛内及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怀疑，有的观望。面对我党的这一国策，许多学者依据各自的政治观、哲学观，提出了各自的“统一模式”。联邦共和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联邦共和制是统一中国最理想的途径。只有采取政治的制度，用民主自决的方式，先制定可以为大陆、台湾和香港人民都能接受的宪法，才能达到统一的目的。

目前，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实行联邦共和制。这种政治制度的特征，是联邦政府与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政府各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宪法，各种特殊的权力和义务，除了军事、国防、外交、全国性的财政经济、交通，属于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由联邦国会及司*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联邦共和制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和风俗方言也不少，地方自治而用民主方式组织联邦或联省政府，分层负责，促进人们的基本权利，自由发展、普及教育，建立合情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依赖于*还有人认为，“一国两制”要在联邦制的国家才能行得通，才有持久稳定性。因为在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对等的，地方的权力源于地方人民公意之授权，而非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因此地方上的重大决策，由当地民意机关决定，不必报请中央政*这种模式的疑点，在于脱离了*中国实行的治国之道，与美国等国相同。中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的具体条件，套用这种模式未免过于简单化。大中国邦联这个模式是费

希平在 1984 年 10 月对国民党“行政院”的质询中提出的。他说，所谓邦联，就是许多国家为了实现其共同利益，自动组成的结合体。它与联邦国不同之处在于，联邦是各邦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立于各邦之上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有统制各邦的权力，而邦*根据以上说明，邦联具有下列特征：各邦都有独立的内政、独立的外交、独立的国防，在各邦之上没有最高权力机构。

邦联盟约的制定和修正，必须经各邦的同意。邦联虽有盟约，但各邦有自由退出之权。

费希平说，台湾可以根据邦联盟约申请进入联合国，逐渐与世界各国恢复邦交，重新踏入国际社会。今后中国如果进攻台湾，那就不仅是中国内政问题。台湾与大陆在联盟之下，经过几十年，人民在生活中会体验出来究竟是哪种制度更适应中国，然后以公民投票解决*这种观点，不仅把中国的领土统一看作是很遥远的事情，还在设想怎样将一个中国拆开来，“各邦都是国家”。“奥运”模式香港《九十年代》杂志 1985 年 1 月号发表了杨力宇的文章《从“一国两队”到“一国两制”》。

杨力宇说，1981 年中国提出了“奥运模式”(注：中国并未提出“奥运模式”)，即一个国家，两支体育代表队，台湾经过一番细心的考虑及内部辩论后，在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及“行政院长”孙运璿的建议下，经蒋经国总统同意，接受了这一模式，以免在国际上更*杨力宇认为，现在中国既然已欣然同意台湾留在“亚银”等国际组织中，亦应同意把“一国两队”原则发展为“一国两席”，这是“一国两制”的应有的方向。因此，中国不但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大原则下，同意台湾留在现有的国际组织中，还应同意台湾回到已退*这一观点显然有偏颇之处。

首先，“奥运模式”并不是模式，只是中国在处理单项问题时所采用的特殊方式。此外，因没有宪法和法律保证，这只是一种方案，恐怕也不足为模式。

其次，“中国台湾”“中国台北”与“台湾(中国)”“台北(中国)”，其含义有本质的不同，不可混为一谈。召开国民会议有人认为，在大陆与台湾相隔 30 多年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之间的直接谈判既不可能亦不妥当，应该先由海峡两岸学术界互相访问考虑，交换意见，经过一定时间双方民间交通，由大陆、台湾、海外三方人士组成国民会议，让各团体的代表在会议中能有发言之地*曾任台湾文化大学经济系教授兼辅仁大学教授的侯立朝，1980 年 10 月，在台湾《中华杂志》上发表文章，对这种国民会议提出了他规划设计的方案。

这种国民会议，首先应结合国内外志同道合，有一定代表性及信誉之人士，组成国民会议促进会，推展国民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包括：预备阶段——组成国民会议促进会，负责推动和平统一工作，协商国共两党，召开预备会议。

完成阶段---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号、国旗、宪法、国体、政体以及有关民主建国问题，预备阶段的工作：力促共产党放弃马列主义，回归民族立场。放弃斯大林命名的国号(注：中国国号并非斯大林命名)，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放弃国共和谈，赞成国民会议。

力促国民党放弃五不的矛盾政策，国是决于公意，放弃铁幕政策，让人民自由接触。放弃以台湾为中国，扩大心胸眼光。放弃一党专政，使国共两党仇恨意识淡化，自我意识淡化，异化思想收复。都回到中国来了，全国

也有开放的自由，人民都觉得和平统一中国是好*预备会议——先召开预备会议，以议定“和平统一工作纲领”为主，沟通和平统一的过渡办法。代表人数宜少，并且要有专精知识，以及大公无私超党派的胸襟，共谋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千秋事业，缔造一个新的中国。

国民会议——根据预备会议的“和平统一”工作纲领和实际情况良好发展，再召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就是最新最高的特别国会，以代替国共双方的人大、政协等机构。其主要任务是，通过新宪法，任命临时政府，直至新宪法选出的正式政府成立为止。监督临时政府*在预备阶段要准备好的办法是：预备会议代表推选办法，和平统一工作纲领；国民会议代表推选办法，新宪法草案，民主建国工作实施计划。都要先行公开宣布、请全民讨论。也可以请国民提出办法，经过讨论，公决实行。

国民会议促进会，可以在国内外各地成立分会，完全采取俱乐部的形式，绝对不采取国共两党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模式，只要和平统一工作完成，国民会议促进舍即可解散，或改组为“和平民主建国促进会”，从事绿化、保护生态、保护劳工福利、保护消费者主权、促*这个观点和办法，用意不错，构想也很详备，但统一这个问题，又怎么能够回避国共两大党在中国台湾和大陆起主要作用的现实呢？因此，这个国民会议的设想，充其量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分别存在，和平竞争”模式台湾留美物理学博士、台湾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沈君山，对和平统一有不少见解。1984年1月23日，他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文章，介绍自己的观点。

沈君山说，未来，在和平竞争的情形下，大陆上存在一个敌对的政权，固然对台湾构成一个有形威胁，但也未始不是促进团结、进步的动力、对大陆而言，实行不同制度的台湾，是一个对比。知识的日见开放，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逐渐来往，会使得大陆人民更加了解什*渐渐地，不但是生活水准，而且安定公道等其他方面的差距，也都会随着制度的逐渐改变而逐渐接近，那时，民族的共同性，包括血缘、文化、语言等；地缘的互补性，包括资源、人力、市场等，会使得统一成为很自然的事，那时的统一，才是水到渠成的统一。

沈君山认为，中国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一个不可能实行的宣传口号，因为一个国家中，可以有两种制度的竞争，而在一个政权之下，不能容忍有两个制度的存在。

中国所提出的“一国两制”，实际是要统一在北京的中央政权之下。

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法统（正统）之争，而无主权之争，所不同的是，那时是一朝一姓的继绝存亡之争，现在是一个制度的继绝存亡之争。民主时代谈法统，应该用制度——包括象征此制度的国号、国旗的延续行为解释，中国人谈中国问题，应该跳出国际法的窠*因此，中国文化便是共同象征的主权，在这象征的共同主权之下，要坚持两个治权（包括外交权和国防权）的分别存在，只有这样，制度的竞争才有可能。

这种观点与“一国两治”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一个国家”是指难以以为继的“中华民国”；他的“中华文化象征主权”仅仅是个“象征”，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其实质是“两个治权分别存在”，直到“将来”。一国两治这也是沈君山提出的观点。他说“未来台湾与大陆关系的最佳方式，乃是‘共享主权，分拥治权’的‘一国两治’模式。”所谓“一国两治”，就是在一个国家主权之下，实行不同制度的两个地区，各有独立的治权。这个治权是完

全的，包括自卫权、外交权和国际上具有国际人格的政治实体的权利。

它仅仅受以下三点约束，即各地区之间不得使用武力，不得在国际上与第三者联合，作损*沈君山说，“一国两治”的理论基础是“主权史传，治权民予”，主权是抽象的国家象征，治权力具体的政治权力。主权代表历史的传承，象征未来的发展，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应及早确定。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由海峡两岸共同组成一个不具有实际权力的*但是，主权的统一共享，应以治权的独立分拥为前提，对于一个能在国际上独立生存的地区，治理它的权力的根源来自该地区的人民。

沈君山说，“一国两治”与“一国两制”有三个基本的不同点（1）在“一国两制”中，主权和政权皆属中央政府，地区所拥有的部分可以自主的治权，是中央给予的。因此，体制、人事的决定包括是否实行两制，其最高权力来自中央。在“一国两治”中，治权原来就属于地区的人民，因此体制人事的决定，完全由该地区的人民（2）在“一国两制”中，因为地方拥有的权力，由中央许可赋予，因此，凡是被许可的，都要规定出来。凡是没有规定的，就是不许可的。在“一国两治”中，权力的根源就是地区人民本身，因此，只有不许可的才予以规定，凡是没有规定的，都是许可的。

（3）在“一国两制”中，国家有一个重要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不变的，在部分地区实行的次制度，其发展不得影响更不得威胁主制度。在“一国两治”中，两个不同的制度在不同的地区发展，平等竞争，最后由时间和实践来决定哪一个更适合国家发展的制度。

沈君山认为，真正可行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在各拥治权平等对等的互相竞争。“两制两治”这个阶段会延续一个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两个地区本身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会变化的。

两种制度其自身和实践方式，会由于需求而随时间修正，所以不需要100年的保证，重要的是改变本身一定要反应这个地区的需求，一定要出诸这个地区人民的意愿，不可出诸“中央政府，’片面的决定。

两个地区的关系，可以渐渐由对抗而竞争而合作，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保障两制的并存，并不永远要经由绝对的两治。

沈君山说，和平竞争相互影响的结果，逐渐现代化的大陆，将会放弃“四个坚持”，逐渐采用在台湾现代化已有实践证明的制度。他很有信心他说：“我们谁对谁错，就让实践去检验真理吧！”沈君山“一国两治”的模式，虽然与我党提出的“一国两制”，只有一字只差，但实质却大不相同。

“一国两治”模式的要害在于试图继续保持“一中一台”的现状。“一国两治”虽然明确主张一个中国和反对台湾独立，主张两岸接触和交往，但又主张台湾成为“国际人格”的政治实体；使海峡两岸成为没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隶属关系的平起平坐的独立地区。“一国两治”模式的要害还在于，它希望无限期地拖延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沈君山强调两岸差距太大，条件不太成熟，统一“不是在今天，而是在未来”，统一问题上有一个长时间的过渡期，从而将祖国的统一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蒋经国在1981年曾经讲到，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他一贯不认为有台湾问题，而提“中国问题”实际是如何取消大陆上的“共产专政”问题。

再明白一点来说，蒋经国所谓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必使大陆实行“三民主义”，重建“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中国，样才能符合所有民主国家与自由世界的长期权益，有裨益于界的安全与和平。除此以外，别无

他途。

同年 5 月，蒋在接见《远东经济评论》记者时又说道：“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大陆的主要凭借，是三民主义而非武力。过去 31 年来，已经证明我们的努力已获得中国大陆人民的向往，时间愈长，唾弃共产主义的人愈多，就愈能证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必然性。

同年，时任台湾当局“行政院长”的孙运璿，在一次答美联社记者时说，我们绝不放弃原则与中国进行任何接触或谈判，除非中国公开宣布切实放弃共产主义及其制度，忠实遵奉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创导的“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并尊重“中华民国的国体、国旗”台湾一家有影响的报纸，曾在—篇评论中提出，只要中国抛弃共产主义，认同于贯彻“民有、民治、民享”理想的三民主义，中国就可以不必依靠所谓“和谈”而统一。中国如不能遵从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理想，实施“三民主义”，则任何统一、和谈都是虚妄的调*台湾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在成立宣言中提出，中国的统一，必须遵循三大基本原则：一是中国必须放弃共产主义，统一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二是中国必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统一在“中华民国宪法体制”之下；三是中国必须放弃马列毛思想，统*时任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蒋纬国，曾发表一篇题为“主义战争”的文章，强调要遵照蒋经国的“训示”，“以三民主义光复大陆”的总体战略构想，以积极的作为，细致的规划，有效的行动，使之“具体化并付诸实施”，而不致于“流于口号”，变成“幻*比起其他模式，“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为国民党当局多年来抓住不丢的一个口号，只是新近又提出“自由民主统一中国”的口号。

三民主义，可以说是国民党最早提出的政治口号。

国民党应该知道，所谓的“三民主义”在大陆人民心中没有好印象。1949 年以前的中国，在大官僚大资本家聚敛财富的同时，政局混乱，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以致使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败退台湾，偏安一隅。

国民党到台后，吸取教训，并在外国势力主要是美国的授意和援助之下，改善治邦方针，从而使台湾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国民党因此能在台湾站住脚。这可归功于政策的调整，人民的洒血挥汗，而不是“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国民党对中国统一提出的官方口号，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发展，再提这种无新意的东西，实际上表明国民党的无力。

相比之下，我党根据中国国情，深思熟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国两治”的科学构想。这是经过历史的扬弃、筛选之后，作出的较为科学的抉择。

邓小平说，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只要有自知之明，就不要想以台湾统一大陆。

明眼人不难看出，关于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尽管方案很但归根到底不外乎统一、独立、维持现状三种。

独立之路走不通，国共两党和两岸人民都会反对。统一有中国的“一国两制”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自由民主统一中国”，前者是要长期共存，谁也不吃掉谁，而后者是要以代替、吃掉对方为前提，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做不到的。有些所谓统一模式，*至于在“统”和“独”之间，骑着墙走，保持现状，这是不能长久的，最后不是倒向“统”就是倒向“独”。所谓联邦、邦联制国家，一国两治，等等，实际上无非都是拖延分裂现状的

模式，其中幻想的成分较多。

1987 在谈到两岸关系及其前景时说：“台湾海峡两岸必须统一，这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心声，要以本身所奉行的主义去把对方统一过来，都是不现实的。大陆执政当局提出‘一国两制’遗憾的是，“一国两制”这样一个从现实出发的办法，一些人并未弄清它的实质，也没有进一步探讨它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就急急忙忙地予以否定或抵制。

所谓“一国”就是一个中国，核心是一个中央政权“在同是中国领土的大陆和台湾，如果同时允许合法存在两个对外行使主权的中央政府，那就不是一个中国了。

既然“一个中国”就是一个中央政权，那么这个中央政权就只能是在以下四种情况中途择其一：以台湾为中央政权，吃掉大陆；以大陆为中央政权，吃掉台湾；以台湾为中央政权，保留大陆“治权”，参与台湾中央政权；以大陆为中央政权，保留台湾“治权”，参与大陆中央政权。

显然，第四种情况是最合理最切实可行的，其他都是有悖常理的，很不现实的。

台湾地区无论在土地、资源、人口、地缘，或者国际地位和整体政治实力上，远不能与大陆相比。

但是，国民党当局历史的、现实的包袱大多，太重，顾虑重重。最突出的是，国民党当局害怕“被贬为地方政府”。其实，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省”而不是一个“国”，国民党台湾当局必须有勇气面对这一历史的现实。

不过，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在祖国统一之后，台湾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其地位会高于一个省，高于其他特别行政区。

1998 统一？现在，海峡两岸实行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大陆实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其实也是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

现在台湾实行的本质上是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它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方面，都与过去有很大的变化如今的国民党已不是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也不是 80 年代以前的国民党。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它认识它，也要研究和认识台湾新立的一些政党和政团，研究*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台湾社会，都要有一个再认识。

大陆的社会主义和台湾的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各有特点，各有优势，都是有利于发展各自的经济，有利于振兴中华民族的。还是让它们长期共存、相互补充、相互竞赛为好。双方都不要轻易否定对方，而意图取代或吃掉对方。

只要双方消除敌意，形成共识，都从振兴中国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是不难通过对话、协商、讨论，找到合理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的。

既然双方都主张“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双方都不愿以武力解决问题，那就应该坐下来，共同探讨“一国”与“两制”之道。

如果说台湾方面在正确对待“一国”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那么，大陆方面在保证“两制”上就负有更大的责任，更应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以消除对方对实现“一国”的恐惧。

1998 “一国两府”与“弹性外交”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长期以来

都是强调坚持“反共复国”的基本口号和采取对中国“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是从国民党十二大后，其大陆政策作了较大幅度调整，企图逐渐向“一国两府”的构架过渡，并以此作为处理外交、内政及两岸关系*所以，1989年初“立委”林任祥在“立法院”提出“一国两府”主张后，立即得到俞国华、连战、肖天赞等高层党政官员的称赞和积极回应。这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由于当时内部意见不一，才暂时“冷寂”下来。李登辉出任总统时，以为内外时机已经成熟*台湾当局也相继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先于1989年4月宣布，派出以国民党中常委“财政部长”郭婉容为首的代表团，参加5月北京举行的22届“亚银”理事会，继而通过决定允许台湾大众传播界到大陆采访、拍片、做节目，以及教职员赴大陆探亲。台湾青年体操队也于*如果说“一国两府”还不过是一种“理念”，那么这些做法就是为实现这一理念而采取的尝试性行动了。

“一国两府”是台湾国民党新大陆政策的核心，其基本点有一是主权原则。海峡两岸，各有自己“独立的主权地位”，台湾不再坚持自己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在国际上同样是代表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其近程目标是“重返某些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长程目标是“重新参加联合国”。台报称，“各拥主权”，这*二是对等原则。海峡两岸应是“对等政府”，不是“隶属”或“主从”关系。你管中国大陆，我管台、彭、金、马，平起平坐，隔峡而治，同具“合法性”，同为“统治中国的政治实体”。台报称，这是它与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第二个“最大”不同。

三是过渡原则。一个中国内，“两个对等政府”，它“既顾全了两岸的现实状况”，又“不损害中国和平统一的前景”。从远程看，两岸自然是“一国一府”，而从近程看，两岸只能是“一国两府”，这是处理“统一前的两岸关系”的最好“过渡模式”，也是与“国*表面上看台湾当局鼓吹的“一国两府”，似较过去理性和务实。一则不再自称“代表全中国”，二则确认“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三则未放弃“一个中国”的立场。其实则不然。

偏安一隅的台湾国民党当局，早就不能代表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得到全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承认。台湾当局所说的“一个中国”，不过是一种遥远渺茫、可望而不可及的“虚无憧憬”，而所追求的实际目标，则是“两个对等的政府”“重返国际社会”。

显然，它是借此否定北京中央政府的地位，形成“主权分割”的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局面。所称“一国”是虚，而“两府”则是实。因而，它实际上是要在“一个中国”名义下搞“两个中国”。

“一国两府”比“弹性外交”“双重承认”更具有危险性。

过去，国民党出于政治需要，把中国描绘得比魔鬼还要可怕，结果谁也不敢与大陆往来接触，相互隔绝近40年，使“台独”意识得以蔓延和发展。后来，蒋经国晚年感到这样做大危险，这才来个开放对大陆探亲。如今，国民党当局似乎忘了这一教训，又一个劲地给“*一个中国，只能有一个统一的主权，代表国家的自然也只是一个合法的中央政府。国民党的统治已于1949年在大陆被推翻，无论就常理还是法理，就国内法还是国际法，对国内还是国外，台湾当局都不能代表中国了。如果不顾这一切，硬要把统一的主权分割为二，*两岸本来就不是对等的。人们都知道，长期以来，中国只有一个，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台湾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55，

土地只占全国领土面积的 1 / 278 多一点。这种历史形成的主体和肢体、母体和子体、中原和边陲，怎么能完全“对等”呢？如果都这样，那有人说：“两个中国”可以作为向“一个中国”的“过渡”。这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

既然彼此都是政治实体，都具有“独立的主权”“独立的国际人格”，那有什么保障可以使它一定向“一个中国”过渡而不是进一步向“台独”过渡呢？“一国两府”明显行不适。

香港回归祖国之厄，到 1998 年，海峡两岸也不会出现台湾当局所祈求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但是，它仍然对海峡两岸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国两府”政策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因素，增加了祖国统一的难度。为了实行“一国两府”，台湾当局推行“弹性外交”，设法与其他国家重建“外交关系”，扩大与提升“外交关系”，将加剧两岸在外交上的斗争。

台湾当局所谓“弹性外交”，有一个发展过程。

早在 70 年代初，台湾当局为联俄共压我党，曾提出将“不惜与魔鬼打交道”，这在当时确是出于策略上的某种考虑。后来，因为内部有不同意见而作罢。

70 交”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以经贸为中心内容的民间性往来关系，并且不包括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结果比较顺利，我党也并未加以反对。

近年来，台湾当局提出“弹性外交”，这与以前的做法，有着根本的不同。以前是以“一个中国”为原则或前提，现在则是在“一个中国”名义下兜售“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口头上“一个中国”，实际上“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就是现在所谓“弹性外交”的本质与核心。

日本《东京新闻》在 1989 年 1 月就指出，台湾所谓“弹性外交”，实际是“心照不宣”的所谓“一中一台”，一语道破了天机。

1987 年，兹、莱索托、几内亚比绍等“建交”或恢复外交关系。

台湾当局所谓“弹性外交”，实际上是执行“一国两府”为中心内容的分离主义路线的产物。

对与无“邦交”的国家，台湾当局大搞经贸实质外交，增加双边贸易，拓展对外投资，实行低利贷款，力求透过经济管道来提高非官方关系的实质官方层次，甚至力图借此在一些国家推广美国式的“在台协会”和《与台湾关系法》等。

对与我党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台湾当局则选择经济上有困难的或者有其他弱点者，不惜以金钱利诱或收买等办法，力争能同时与台“建交”，以图实现“双重承认”。

据台报称，在以上新“建交”的一些国家中，所花代价多者达两亿多美元，少者也在 1000 万美元，台湾当局的一些人为之寝食不安，深恐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

对国际上一些地区性、经济性的组织，台湾当局谋求以“独立的政治实体”挤入，企图扩大推行所谓“一国两席”模式。台湾当局美其名曰这是为了扩大台湾“国际生存空间”所必需的，并动员岛内外舆论，想迫使中国为之让路。然而，这样的路又怎么能让呢？台湾当局所推行的“弹性外交”，虽然已有所得手，并还可能继续取得一点进展。但是，可以完全肯定，在“九

七”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的第一年，1998年，台湾当局推行的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弹性外交”，不可能得逞。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并且得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这是无法否认和改变的事实。

台湾当局以分裂为目标的“弹性外交”，不但不可能得逞，而且搞下去十分危险和有害，它将损害两岸来之不易的宽松气氛，增加双方的紧张和敌对情绪，助长“台独”势力的发展和蔓延。

可以实事求是他说，“弹性外交”及“双重承认”，绝不是台湾谋取生存和发展的光明之道，而是一种玩火的危险行动。

台湾政党与台湾未来 1986 历史上极重要的一次会议，蒋经国主持了这次会议，致了《迈向胜利历程》的开幕词。

根据蒋经国的讲话精神，全会提出了“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的全新政治任务。

以后，国民党开始了内外政策的调整，先后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开放大陆探亲等，开始了“政治革新”。这颇得各界人士的好评。

开放党禁后，台湾岛内出现了众多的党派。仅开放党禁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就涌现了 50 自由党、中国民主正义党、工党、中国民众党、劳动党、中国联合党、中国农民党、统一民主*与此同时，成立的政团有全民爱国会、反共爱国阵线、夏潮联谊会、尊老敬贤促进会、政治受难者联谊会等 30 多个政团。

以后，还会成立一些类似的组织。

尽管这些新组建的政党和政团在规模上和人数上，还远远不能与国民党相比，但就整个台湾地区来说，多少已经呈现一“政党政治”或“多党政治”的态势。

在开放党建后新组建的政党中，实力最强的要数民进党，其次是新党。民进党成立于 1986 这些新组建的政党，尤其是民进党、工党、新党等，均有自己较明确的政治主张。

今天的台湾地区，由过去的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走向了“一党独大，多党林立”，确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台湾地区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发展的产物。国民党之所以来取开放党禁这样的“政治革新”措施，完全是被迫而为，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如此。

从民进党突破国民党“党禁”第一个宣布成立新政党的 1986 年来看，那时的台湾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一年，在台湾地区三大产业结构中，农业产值所占比重已由 1952 年的 35.77% 下降到 6.4%，工业则由 17.9% 上升到 47.1%。服务业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但也由面向农业为主转为面向工业为主。总的说来，台湾已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加工出口经济为主的*台湾地区农业人口已从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下降到不足 20%，农民作为台湾地区社会的“最稳定力量”，已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新兴的“中产阶级”代之而起，成为台湾社会中的主要力量。

所谓“中产阶级”，包括 70 多万中小企业主，还包括大量相当于他们生活水平的高中工资收入者，这部分人比较活跃。还有不少所谓“知识精英”，也被列为“中产阶级”。

工人作为新兴的加工出口工业的劳动大军，正在发展壮大。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还比较低。

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不能不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于是，代表台湾地区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利益的政治势力日益活跃。他们要求政治上的地位，要求参与台湾的权力分配。他们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愈来愈感到不满，并由言论抨击发展到了行动对抗。与此同时，美国政界中的一些人，时常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当局建立一个民主而反共的政权，这使台湾许多人深受影响。这时候，菲律宾马科斯独裁政权倒台。此事对国民党当局震动极大。

这样，在国内外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开放党禁，实行所谓“政治革新”。

为了继续维护自己的统治，国民党当局力求把一切新成立的政党和政团，纳入自己的体制和规范之中。于是，继 1987 年 7 月制定和公布所谓“国家安全法”之后，又于 1989 年元月制定并公布了所谓“人民团体组织法”。

按照这两法，所有新成立的政党必须维护国民党为“主政台湾”的执政党，一切遵守这两法成立的政党和政团才是“合法”的，已经宣称成立的政党和政团，也必须依此重新办理登记手续。

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国民党当局才允许社会各阶层结社组党，适当地参与政治。

这样，就形成了国民党一党独大，多党林立的局面。

在台湾地区，除原有的国民党为执政党和随国民党迁台的两个在野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以外，其余都是 1986 年以来新成立的。

1986 年内容的“政治革新”信号。被称为国民党反对派的一部分“党外势力”，闻风而动，抢先于 1986 年及*在台湾新成立的政党政团中，大约有 1/3 的政党，一半以上的政团，都是在 1989 年元月国民党当局公布和实施“人团法，’正式宣布开放党禁前成立的，其余则是在此以后成立的。

所有新成立的政党政团，无论开禁前还是开禁后，多属“抢滩”成立，匆匆忙忙，准备不足。这样，有的党纲宗旨语焉不详，有的社会属性模糊不清，有的组织体制不健全，其成员则百人、千人、万人不等。

这种情况说明，台湾的“政党政治”还处于草创时期，很不成熟。一个国家或地区，其民主的程度绝不决定于政党的多少，政党多者未必民主，政党少者未必不民主。台湾新成立的政党政团员多，但还不能说它就是民主政治。

“开放党禁”前后，台湾新成立的政党和政团，情况是复杂的，趋向也是不稳定的，随着岛内外形势的变化，各种党派政团之间的重新组合和调整，是必然的。

目前，台湾的第一大党仍是国民党，第二大党是民进党。1993 年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新党，成为台湾第三大党。

1998 就台湾来说，国民党是资历最久的第一大党，“百年老店”。

现在的国民党，已和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大不相同了。它不再是旧中国时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以台湾新兴的地方资本势力为主，大陆籍旧的官僚资本势力为辅的两大集团的联合代表。

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倾轧斗争相当激烈。新成立的中国民主自由党、中国爱国党、中华共和党、“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新党以及全民爱国会、

反共爱国阵线等，有些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有的则是国民党的同盟者，它似与国民党或国民党内的某些派系并无“国民党”这个名词，近现代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实行国民党改造运动，真正统一了国民党，国民党的作风与大陆时期相比，发生了变化。

蒋经国继位上台后，继续坚持“乃父”的政策。不过，他也对国民党作了一些改革，扩大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1986年3月，蒋经国为了“对历史有个交代”，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实行“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

蒋经国去世后，随着权力结构的大幅度调整，政治体制的迅速转型，国民党上层权力斗争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其派系的构成，矛盾的焦点和争斗的方式，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国民党各势力，围绕着上层权力分配，经过推行代主席，十三大人事变动，“内阁”改组等多回合的激烈争夺，打破了权力架构的平衡态势，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加速分化组合，派系势力此消彼长。

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中，台湾地方派李登辉成为大赢家。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继承“总统”，同年在国民党十二大上当选为主席。台湾历史进入了李登辉时代。

1988“新”，强调以“新观念”解决两岸关系。他放弃了“反共复国”的口号，确立了政治渗透与和平竞赛的两岸关系新策略，他逐步放弃了“三不”政策，建立两岸沟通管道，开放学术、经*李登辉在台湾很得意地宣称，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已经“新开”了。果然，“国父”思想“已被”“新台湾人主义”的“李登辉主义”取而代之。

“中国国民党”实际上快变成了“台湾国民党”。李登辉成为国民党的“掌门人”之后，“犹抱琵琶半遮面、渐渐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从不统不独滑向了“独”。

1993确立了谋求“对等地位”的“台独”思潮的主体，使台湾开始向独立道路迈进。国民党“十四大”确立的大陆政策，名义上是“促进中国统一，反对分裂国土”的政策，实际上“统”*国民党十四大确立的基本观念有：强调以“台湾人的利益优先”，坚持“两岸对等地位”，以“国统”纲领为依据，循序渐进地发展两岸关系。要求中国、大陆放弃“过时的主权观念”，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事实。提出利用台湾的政治经济优势，本着不*目前，执政的国民党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变化，开始由垄断型向竞争型演进。

随着“宪政改革”的推展及“动员勘乱时期”的终止，国民党在“勘乱”体制下享有的许多政治特权，可以凭借的法律依据都失去了，客观上已完全把执政的国民党推向必须面对选民，注意民意的民主竞争型政党地位。国民党要想保持执政地位，只能够以推行民主政*为了适应这一转型，国民党不得不采取了一些民主措施。一是开放各种选举，同在野党公开竞争；二是实行军队“国家化”，宣布国民党“退出”军队，划清与“国军”的界限，保持军队“中立”；三是理性对待在野政治势力。朝野各政党之间的斗争逐渐从过去非赢*在1996年台湾“总统”选举中，国民党外新党构成继续夺取选票的威胁，内部则面临后李时期中生代的权力争夺，加上李登辉的胜选并未给每况愈下的国民党带来转机，因此，1998国民党面临的问题是，支持李登辉的力量，并不就是支持国民党的力量。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

李登辉实际上是谋求部分党派的支持。李登辉竞选总统的选举策略，也是将他与国民党作出适度的分隔。

新党的出走，给国民党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新党的出走和参选，是导致国民党得票率不断下降的关键因素。

1997 会再现，不是民进党上台，就是新党过线，那么，到 1998 年，国民党就只有抹泪了。

国民党内部存在着权力斗争的危机，通过近年来的省市市长、“总统”选举，国民党内中生代都已经看得分明，自己的生涯要靠自己去闯。

1998 是进行各种结盟，在未来的重大选举中，党内所有人士共同为一个人抬轿的状况将成为历史陈迹。

民进党是台湾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也是台湾最大的在野党。

民进党的成立，是台湾党外历史上第三次组党，也是台湾经济、政治发展以及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民进党的前身，是被称为“党外”政治势力的一部分。1986 年 9 月 28 日，以“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公政会”）和“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为主，以集体签名的方式突然在国民党正式宣布开放党禁前夕宣布成立。在年底举行的“中民进党初战告捷后，一方面继续采取议会路线与街头斗争相结合的方式，与国民党抗争，另一方面加深在各地成立地方党部，扩大组织力量。

民进党的成立与发展，直接刺激了工党等其他政党的涌现。台湾从此进入多元政治、多党竞争的时期。

民进党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在该党党章党纲及其领袖人物的言论中，代表了台湾“中产阶级”的利益。

民进党的主要主张是：鼓吹政党和平竞争乃至取代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要求废止架空“宪法”的临时条款及一切违宪法令，口归民主宪政；废除和调整因戒严产生的相关法令、制度，反对“国家安全法”，重建正常法律体系；废止训政时期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解除不正常的战时管制；废止“动员戡乱时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要求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制定省、县自治原则，省、市长要开放民选。

鼓吹“住民自决”，并力图使这一主张合法化。党纲中公然列入“台湾前途应由全体住民决定”，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没有决定台湾政治归属的权利。在 1988 年 4 月召开的临时全会中，又将“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引入大会决议中，从该党成立以来的言民进党内部派系林立，有美丽岛系、新潮流系及康系以及党外各次级派系等。

民进党的内部矛盾纷争由来已久，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斗争方式上，存在着激进路线和温和路线之争；二是在对党员的约束上，存在着柔性政党与刚性政党之争等等。

该党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否主张“台独”问题上。新潮流系主张将“台独”列入党纲，台湾主权与改革体制民主化是“一体两面”的问题，认为除推动全面改造外，还要强化“台湾独立”意识。而美丽岛系则表示并非反对“台独”，又不愿在党纲中明示“台独”，但*民进党不等于“台独”，但它与“台独”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与“台独”有着解不开的纽带。

民进党的大陆政策，与国民党的大陆政策一样，也一直处于不断演进

之中，从 1986 年 11 月台湾主权独立、从 1991 年 10 月至 1993 年，提出“建立台湾共和国”。从 1993 年至今，是民进党检讨、调整。随着民进党组织机构的逐渐完善，活动的展开，其政治影响力已扩散到岛内外，成为台湾政坛上一股主要的反对力量，其政治动向及发展前途愈来愈受到人们关注。

民进党势力发展迅猛，已成为势力仅次于国民党，远远领先于新党的第一大反对党。

怎样形成了这种局面？一是民进党抓住机遇，不断发展政治势力。国民党当局出于巩固政权及缓解内外矛盾的需要，推动了一系列“政治革新”，并进行了为期 3 年的“宪政改革”，客观上形成了在岛内创造了有利于在野政治势力发展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民进党利用这些机会，不断制造声势与扩充组织，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还在基层建立众多的服务处、联谊会，经过 10 年努力，赢得了 40% 左右民众的支持，还在国民党手中夺得了县市长、省市市长、“立委”及“国代”等部分政治权力，形成了较大的声势。二是重视选举，参与体制内竞争。台湾政党局面出现后，经由选举取得政权，成为朝野政党皆能认同的“政治游戏规则”，民进党利用“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抨击国民党当局施政的缺失，抵制不利于自己的政治运作，迫使国民党修改或放弃，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三是在政党竞争中的策略运用得当。民进党在成立伊始，“野性”十足，曾对自己造成了较大的伤害。1992 年，民进党提出政党类型与体制调整问题，采取措施塑造“竞争型”政党与明日执政党的新形象，以摆脱“抗争型”政党的旧形象，同时淡化“台独”意识，包庇 1996 年民进党内愁云笼罩，士气从来没有如此低落过，许多人对民进党的前途表示悲观。

究竟民进党出了什么问题？1998 年吗？在民进党未来的发展走向上，至少存在有几个问题。

一是党的路线斗争与派系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民进党在选举中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根本无法形成合力。恰恰相反，一次选举只会造成彼此心结的一次次加深。

二是民进党的主张难以开拓青年与妇女选票。

三是民进党的基层组织难以扩充，而中央与基层的矛盾日益尖锐。与此同时，党员的数量也始终难以增加，而党员的质量又低劣，人头党员充斥的问题始终无解。

四是民进党与其他社运团体、“台独”团体的关系也充满着危机。自从党中央提出“大和解”主张之后，民进党即不断遭到上述团体毫不留情的攻击与批判，宛如当年党外时期鸡兔之争，批康风潮再起，最后出现了“台湾建国阵线”与“绿党”彭明敏败选之后自建“新民进党”民进党究竟何去何从？民进党如果赢得 1997 年县市长选举之役，那么关键的一战将是下一届的省市市长选举了。

在执政之前，民进党人将以“台独”为长期的政治祈求，“很难放弃或改变这样一个图腾和胎记”。从目前来看，除非岛内出现了重大的突发的政治变化，否则，1998 年民进党将不可能放弃这一主张。

近年来，民进党不断改进“台独”策略，对其“台独”主张进行包装，提出民进党执政不会出现不必宣布台独的“事实独立说”，并出现了修改“台独政纲”的声音。但是，民进党的几位“大老”施明德、张俊宏和许信良都表示，“台独”主张是“属于国家定位和最*从台湾政局演变趋势和朝野力量

对比发展来看，民进党在成立伊始，“野性”十足，曾对自己造成了较大的伤害。1992年，民进党也不会有惊人的“业绩”出现。近一两年，民进党成立以来不断上升的发展势头明显趋缓。

民进党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走上执政之路及能否走上执政之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民党如何发展，以及民进党如何消除其发展障碍。

新党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倾向于“中国统一”的政党。

1993年“线”的7名成员赵少康等，宣布退出国民党，另组新党，成为台湾政坛上的第74个政党。

这是国民党建党百年来正式分离出去另组政党的派系之一，是国民党开放党禁以来第一个以“国会议员”为领导核心的美式政党。

新党的出现，有其远因和近因。他们内有“主流派”的排挤，外有民进党的打挤，在国民党内的“生存空间”已成问题。他们对当权者的“独裁”表现不满，不愿看到台湾在外国势力的影响下走上“分”或“独”的道路，出于较强的民族意识，决定奋起一搏。

新党“建党宣言”表示认同孙中山先生的理念，并追求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理想，宣言提出的“国家认同”“大陆政策”“外交政策”等八大基本主张，有根多是有利于中国统一的，但其“统一”的理想能否坚持下去，还是一个问题。

新党的成员来自国民党“非主流派”，是国民党内的少壮精英。他们既受“非主流派”的影响，又与原“非主流派”有所不同。他们作为国民党第三代中的年轻“精英”主要是靠自己冲杀出来的。他们同台湾中下层民众和一部分知识分子联系密切，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新党自我标榜为“柔性政党”。新党刚一诞生，就遭到了国民党、民进党两大政党的挤压，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更为不利的是，新党财源拮据，无力拉取选票，再加上民进党又常常利用“省籍情结”煽动民众对新党的不满，说新党是一个“外省人党”，所以，新党*但是，时过一年，新党的形势就大力改观。在1994年底的台湾省市长选举中，赵少康以高出6万张选票和4.28%的得票率，选票居国民党支持的黄大洲之上。新党一举夺下了111994果显示对新党满意者占18.6%，尤其是女性对新党看好，其满意度高出男性一个百分点。

新党的支持率在增加，生存空间在扩大。台湾新兴的正在政治上日益成熟的中产阶级，是新党生存和发展的沃土。这个阶级基本上是一个求“稳”的阶级，既“要求政治变革”，又不接受快速的冒进的变动。因此，他们对国民党“政治变革”迟缓、与财团和地方派系*新党虽以追求“统一”为初衷，但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新党正在淡化其初衷，从主张统一而走向反对“急统”。

1998 尽管新党的实力在渐渐增强，但是其在短期内决定不了台湾社会的走向，不会对台湾社会的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新党自称“柔性政党”，缺乏严格的纪律。新党没有中央党部及分党部各级党务机构，按照“以议会为中心，民意为依托，选举为手段”的组织原则，只在中央设立“立法院委员会”“国大委员会”和“全台竞选及发展委员会”，地方设置县市竞选机构和发展委员会*新党受到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双面挤压，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新党是从国民党中分离出来的一支力量，对国民党自然是一个打击，国民党当局绝不会坐视新党壮大。民进党欢迎新党这又一个在野党，但由于两党政治理念差距很大，民进党又常常利用

“省籍情结”新党缺乏雄厚的财源作经费，这会严重影响其发展。而且，新党成员原属国民党“非主流派”，又多系外籍，又主张，“统一”这也严重影响民众对它的支持。

从台湾社会的大环境来看，1998年，新党也不会主导台湾社会的走向。目前台湾中小资本或中产阶级的实力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制衡力量。这种情况，使任何政党，都不大可能实现“独霸天下”的局面。

不过，新党能否继续发展，关键就看未来这两年，新党要想有所发展，如何确定政党定位，确定发展方向，落实党内民主制，调整党内领导模式，巩固并扩大基层支持力量，积极发展组织，都是新党必须解决的问题。

新党成立之初，是有很强的希望通过“毁党”等国民党垮台后再回到国民党“造党”的目的，非主流派人士也一再宣称新党是正统国民党。从现在来看，李登辉已完全掌握了国民党，国民党短时间内还不至于垮台，新党目前的票源也只限于外省籍，新党必须彻底放弃“新党欲树立自己的独立品质，给它的形象以明确的定位，不但要突破“省籍情结”，吸收更多的本籍精英进入新党，还必须摆脱对于老国民党的“依恋情结”，争取立场较为中文的年轻选民的支持。

随着新党实力的增加，1996年以来，新党内部在未来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新党应持续朝“全民性政党”方向发展，以在选举中不断取得胜利，直到最后执政为目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新党应维持其自身形象，仍以“制衡性政党”为标尺，“新党成立之初，党内非常团结，因为核心成员较少，而且很有默契，其决策模式又浓厚了“人治”色彩，发挥了灵活得力的作用。近年来，新党领导阶层不断扩大，内部矛盾也时有发生，面对党内精英越来越强的参与权力核心运作的要求，只有通过民主方式，建立一“新党从1993年县市议员选举开始，得票率一路上升，稳定成长。但是，缺乏基层组织，难以使“游离票”转化为坚实的“铁票”，可能会严重制约着新党未来的发展。

新党非主流色彩一直很浓，党的基本主张是什么，事实上并非十分明确。在1996年“总统”大选期间，新党全力与国民党非主流“大老”林洋港、郝柏村合作，林、郝直称新党“具有国民党正统精神”，加上两人加入新党传闻不断，立即使党内出现了是“新国民党”“新党坚持走议会选举路线，与采取刚性党务组织的国民党、民进党不同，因此始终难以切实地掌握基层票源。党内人数不足，也构成制约因素。因此，未来两年如何耕耘地方基层组织并积极培养新生代，已成为严峻的考验。

在都会地区，新党可以说已经稳了脚跟，但在中南部地区，尤其是云、彰、嘉、屏、宜等农业县份，则票源仍有待开拓。未来如何进一步提高得票率并争取获得地方执政权，新党还有待艰苦努力。

总的来看，是统还是独？是真统还是假统？统一和民主应该是一致的还是对立的？应该从中国的角度来考虑台湾还是只从台湾来考虑台湾？台湾人民的利益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否是一致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台湾岛内国民党以及国民党以外各政党政团所共同面对“台湾各政党未来的命运，与台湾的未来和命运是相连的；而台湾未来的命运，又与两岸各政党政团制定和实行怎样的政策分不开。

表面上，台湾各派政治力量和它们的政党组织是驾驭政治的主人，是处于决定和支配命运的地位的。而实际上，它们的一切政策和做法，都将在

以上问题面前接受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检验，由人民最终决定它们的命运。经得起检验的或得民心的，现虽力*

台湾能独立吗在一片统一祖国的呼声中，夹裹着“台独”的嘈杂之音。“台独”杂音的出现，有其社会历史因素、现实因素和国际素，是一股不可轻视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倾向。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西方帝国主义把“台湾独立”变成实现其殖民主义的“远东政变”的一种手段。1943年“开罗会议”讨论宣言时，英国就曾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人则提“战后台湾由国际共管”，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才没有把这些谬论写进宣*违背民族大义，自外于中国人的“台独”，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由一些不甘失败的日本军阀及其走狗发起的。日本对台统治 50 年中，尽管不断遭到台湾同胞的反抗，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很不成功，但还是培养了一批走狗和汉奸。

“台独”的主要言论有“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领土不是中国领土”“台湾前途由 1800 惯等方面已不同于中国人”“台湾原住民即台湾人民虽然还没有达到独立民族的高度，但已*长期以来，“台独”分子一直以“台湾民族”的存在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目前台湾人中几乎有 98% 的人大陆上福建、广东两省的移民，原本就没有什么“台湾民族”，其理论无法成立。

“台独”的战略目标原是推翻台湾国民党政权，并防止新的外来“侵略”（指大陆），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国家”。

近些年来，海外的台独活动已逐渐进入台湾岛内。1986 年 9 月成立的民进党，在台湾前途上主张“住民自决”，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成为一个“台独党”，势力一步步发展壮大。民进党的发展，使台湾的前途充满了无穷的变数。

然而，更使台湾的未来充满险情的是，国民党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与民进党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张越来越趋同，正在一步步滑向“台独”。在台湾地位问题上，民进党主张台湾拥有独立主权，国民党则主张台湾是一个“独主政治实体”。两者看法相近。

李登辉上台以后，提出以“新观念”解决台湾问题。他的“新观念”具有明显的“台独”色彩，隐含着“一国两府”“一中一台”的强烈愿望。他慢慢地改变其反对“台独”的初衷，而不断流露出偏袒“台独”的倾向。

在“新观念”的支配下，李登辉已用“台独”和宽容“台独”两条鞭子，把台湾社会渐渐赶上了独立之路。

1995 理念。

1996 香港回归之后，未来几年，台湾能独立吗？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都在想的问题。

1979 1984 议，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中国政府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1987 年 3 月，中国政府根据这一方针与随着 1997 年香港的回归，台湾问题已进一步摆上了我党的议事日程。

我党在坚持和平统一总战略的同时，始终不承诺不使用武力。

1995《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江泽民说：“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中国大陆是不会允许台湾独立出去的。中国大陆已经基本明确了对台大规直接使使用武力的几种情况 :1234 中国政府不承诺对台不使用武力，因为这是中国对台政策的基石所在。不承

诺不使用武力，以武力作后盾，这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丝毫不会对台湾民众构成任何威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两岸关系稳定的根本原因所在。

考虑到两岸战争的结果将是悲剧性的自相残杀、同室操戈，尤其从根本上有损中国的长远战略意义，中国政府以武力作为最后手段，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只是力图威慑台湾，使其不要孤注一掷地走向独立的深渊。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95年，腐败的清政府战败，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长达50年。这给全中国人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在中国，哪一届政府也不愿在自己手中把领土丢掉，因丢失国上面“名垂青史”。中华*台湾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如此重要：从战略角度来看，台湾位于中国大陆架东南边缘的海面上，东濒太平洋，距关岛约2800公里；南隔巴士海峡，离菲律宾300公里。台湾扼守中国南北海上交通，是西太平洋各国联系的交*台湾一旦宣布独立或即将宣布独立，中国必然不会坐视，两岸战争必将爆发。大陆百万大军横渡台湾海峡，直插台北、高雄等地，台湾必将毁灭。中国大陆有能力做到这一点，1996年计设从台湾方面来说，其战争承受力非常脆弱。台湾是一个岛屿，在战略战术上具有一个岛屿所具有的不利条件。台湾又是一个离大陆很近的岛屿，一旦发生战事，台湾将会遭到优势兵力的四面围堵。海峡两岸发生战争，台湾的主要工业中心、主要港口、航线，将难于经*台湾的自然资源有限，主要通过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从事各种海外贸易投资来维持繁荣。台湾对战略物资的严重依赖，成为战争爆发期间最致命的弱点。石油、煤、钢铁等重要战略物资，主要依赖进口。一些工业及民用所需的基本原材料，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也*台湾共有8条定期国际航线，2条不定期航线，原油主要来自中东各国，中东航线至关重要。

一旦战事发生，在中国大陆对台湾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台湾将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因此，不承诺放弃武力，是中国大陆遏制“台独”的重要手段，台湾受到制约，不致轻易走向“台独”。

有人说，台湾独立是美国无言的承诺。

美国，还有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一定会让台湾独立吗？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一直企图领导世界，以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资本主义制度“统一”世界。在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直是美国眼中的沙子。

美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图谋未能得逞，不得不于1977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抱着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企图不丢。美国一直把台湾问题作为制约中国发展的一个法码。从长远来看，美国也不想失去这个法码。如果台*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原则一直是由国务院和国会唱“双簧戏”，一个支持“一个中国”，一个支持“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美国企图在大陆与台湾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在恪守中美三十建交公报并同时又不悖《与台湾关系法》之间游离，并期望在*有理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总有一天要摊牌。美国向中国摊牌，尤要考虑到下列因素：(1)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和平解决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台湾避免战争带来的破坏，它符合海峡两岸人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期待，也同美国所谓“关心和平方解决台湾问题”不相冲突。

(2) 一方面尊重拥有 10 多亿人口的大陆中央政府掌握大陆政策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对台湾实际控制力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尊重几十年来台湾形成以一套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与大陆不同的现实。

(3) 一个稳定的中国，有助于亚大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